

黨國要人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黨國要人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293B

編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1928



胡 漢 民

□ 胡漢民之略歷

胡漢民先生，爲中國革命史上極重要之人物。年二十六，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以一九零三年，隨孫總理奔走國事，任同盟會中央黨部秘書。時南方革命運動，進行甚力，先生爲同盟會南方總支部部長。黃花岡一役，躬與其事。辛亥光復，廣東省議會舉爲都督兼理軍民政事。民國元年，任總統府秘書長，迨總理辭總統職，先生遂返廣東復任廣東都督兼民政長。民二隨總理東走日本，仍進行革命，民五袁世凱死後，隨總理回國。廣東省議會舉先生爲參議院議員。民六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孫總理率國會議員至廣東組織大元帥府，以先生爲交通部長。民七廣東省議會舉先生爲廣東省長，辭未就。民十一年，國會在廣東開會，舉總理爲大總統，先生任總參議職，總理督師北伐，任先生爲大本營文官長兼秘書長。民十四年，孫總理督師北伐，以先生爲留守，代理大元帥職，兼任廣東省長，後又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主席之職，先生於是平東江，驅楊希閔，劉震寰。旋孫總理在北京逝世，政治會議決議改組大本營，成立國民政府，先生任政治會議主席，及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外交部長等職，共產黨忌之，是年九月，以病告假，出遊歐洲。民國十五年四月，養痾海上，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先生任中央執行委員，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主持全局。民國十六年八月，復辭職遨遊歐美。先生追隨孫總理二十餘年，篤信總理之主義，翊贊總理之事業，富於政治經驗，規畫周詳。其爲人廉樸正直。治學極勤，見者幾疑爲一老書生，而不知其爲大政治家也。故先生在國民黨中，深得同志之信仰云。

黨國要人 胡漢民最近言論集目次

上編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一

青年的煩悶出路.....三一

革命的努力與方向之認識.....五四

武漢方面三種反共與三種心理.....六三

清黨之意義.....六九

下編

三民主義之認識.....一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二

六月十六之迴顧.....一九

次 目

黨國要人胡漢民最近言論集

上編

國民黨民衆運動的理論

一、一般的觀察

民衆運動在中國已由多年實際的試驗時期進到理論的確立時期。經過多年試驗的行程當中，我們應該把民衆運動一般現象作一個總觀察，從觀察當中，估定它的內容和價值。

先就它的一般現象說，我們知道凡是民衆運動，其起因總是由於社會的大變或國家的危亡。民族間戰爭的失敗，外人的欺凌屠殺，軍閥官僚的賣國殃民，少數特權者的荼毒壓迫，都是直接製造民衆運動的原料。沒有這種種原料，民衆運動的火燄是燃燒不起來的，縱燃燒也不長久，也不普遍。在中國，軍閥的迭起，帝國主義者的相繼掠奪，續續供給我們民衆以運動的燃料，而我們的民衆運動因之也有備具永久性的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民衆運動是最富於狂熱性的，其所感受的刺激大，其所發的刺激亦大。巨風怒雨，固然發了天地間不平之

氣，然狂暴的傾向，也隨着而來。所以凡是個人批評的理性，一到羣衆的狂熱裏面，就最不容易表現，而反常的行動，往往隨狂熱與俱進。這種民衆運動的現象，便引起了世人兩種的批評：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富危險性的，是不應該有的；一種認定民衆運動是最有力量的，最能促進社會的改造：前者是法國心理學家呂邦的態度；後者是革命者的態度。但是社會不能免避罪惡，不能保證不遭受危險，則民衆運動自不能保其不發生。所以問題並不在民衆運動是否應該有，而在如何使民衆運動成爲有益於社會生存的利器。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點。民衆運動，結果往往歸於失敗，歷史上這種例很不少，而且失敗的結果，往往引起社會民氣若干時的消沉。究其失敗的原因，不外幾種。如果是由於目標太多，或問題太複雜，則民衆到了認清一個總的最大目標，或找出許多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的時候，還會運動起來。如果失敗是由於民衆運動當中起了野心家，那末民衆，久必將轉移他們的目標，向着野心家掙擊。如果失敗的原因，在於敵方的壓迫太強大，那末民衆勢力一時屈服，不久必將再起，而且再起的力量必將更大。假使失敗的原因，由於思想錯誤，方向歧謬，則民衆因失敗而受的教訓和覺悟，比什麼教育制度所生的效果還要更大而更敏捷。這是應該注意的第三點。

依第一點說，民衆運動是挽救國家危亡和保障社會生存的一個力量，是應該鼓勵的。依第二點說，民衆運動便有如何始可使之成爲有益於社會的問題。依第三點說，民衆運動，失敗和成功，都於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們的問題，便是要如何纔能使它成功多於失敗，及如何使它好影響多於惡影響。總括地說，民衆運動一定是以救國救社會爲目的，要保證它的成功和好影響，自然要有必具的條件。這些條件當中，第一須有不拐騙民衆的忠實領導；第二須有強固的組織；第三，須有共同的信仰。這三個重要條件完備了，民衆運動纔有不可搖撼的基礎和不可抵抗的力量。

這幾年來，在民衆運動當中奮鬥的，表面上都是一個國民黨，而暗地裏冒國民黨招牌做非國民黨工作的，却有一個共產黨，或不僅是共產黨。這種現象，便是拐騙民衆的第一義；因爲挂羊頭而賣狗肉，主義上政策上也就隨着換了內容，便是信仰上起了裂痕，這是拐騙民衆的第二義；信仰被搗亂，招牌被假冒，組織上也自然生出許多衝突而矛盾的系統，這就是拐騙民衆甚至拆散民衆的第三義。共產黨拐騙民衆的罪惡，我不要在這裏細數，我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依這三種事實的綱領，可以更指示出一個原則來，就是：凡是民衆運動，只能以一個黨爲中心，只能

以一個信仰爲目的，而且只能以一個黨一個信仰爲力量的總發動機。所謂一個信仰，須得要基於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所謂一個黨，須得要以民衆相互利益的總信仰爲努力的總目標。信仰統一，民衆相互利益就要由黨來企求；黨的組織統一，民衆一切組織就要以黨爲中心，而一切活動就要由黨出發，一切政策由黨透過，一切工作由黨分配。更深切地說：民衆運動，沒有以全體的利益爲歸宿的主義，便沒有精神；沒有全體對於主義的信仰，便沒有組織的可能性；沒有組織的可能性，便沒有力量。必須拿得定主義，固執着信仰，集中在一個黨的組織裏面，然後民衆運動就可以把國家的權力和社會的權力打成一氣，把國家的政治機關和社會的公衆機關連成一個脈脈相通的血流；必如此，民衆運動纔可以成爲改造國家和社會的偉力，纔可以成爲處在次殖民地苦境的中國的生力軍。

依前述的原則而批評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可得許多極有興味的觀察，而且此種觀察，很可爲前述各原則的印證。第一，共產黨的主義是不敢告人的，而其不敢告人的證明，就在於假借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名義向民衆接觸；反面的說法，就是共產黨若不冒國民黨的招牌，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得民衆的信任；共產黨沒有東西，就是拿不出真實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

主義來；沒有真正以全體民衆利益爲歸宿的主義，而冒他人的黨和主義以騙取民衆，其原因乃在共產黨另有其不可示人的鬼胎，而視民衆爲其鬼胎的工具。第二，共產黨是主義的寡情者，然而其策略的迷信者；牠也曉得民衆運動是起於國家社會之發生大病症，然而牠却犯着主觀病，其主觀病的沉重，乃至不問國家社會所生的是什麼病症，不求引導民衆，把病症救治完好，而只一味的施用策略以造亂；國家是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牠却要引帝國主義來壓迫得更甚；社會是已陷落在貧困瓦解的境地，牠却要引社會由貧困瓦解之境而趨於破產流離之境，由破產流離之境而趨於自相殘殺以至於滅亡。第三，共產黨以爲有亂子，就能激得動民衆，引民衆趨向搗亂就能革命，這樣就符合於列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了，殊不知牠在事實上做起來，牠的兩大對壘的階級鬥爭便要成爲同一階級分裂爲多少職業，同一職業分裂爲多少派別，同一派別分裂爲多少小組，同一小組分裂爲多少個人，分裂愈多，鬥爭愈多；天下哪有把全個人類全個民族分拆到極點，鬥爭到極點，而可以說這是爲人類爲民族爲個人謀得幸福的革命方法呢？所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起來，牠不但不能做兩大階級團結的鬥爭運動，並且不能做團結中國民族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運動；前者是證明其不能作馬克思理想中的階級鬥爭，後者是證明其不

能作中國所需要的國民革命運動；二者都不能，牠還作什麼民衆運動呢？第四，證以過去的事實，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在軍閥統治之區，却沒有做着破壞工作，而在軍閥已被顛覆之區，倒盡量襲用俄國共產黨的破壞方式，這足見客觀的環境需要破壞的，牠倒不破壞，而不需要破壞的，牠却破壞到民不聊生；且因此而知共產黨所用的唯物史觀，並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乃是廣東俗話所謂「勢利」觀，——軍閥對牠不留餘地，牠倒柔順得很，國民革命軍所到之區給牠活動，牠倒搗亂起來，——結果就是需要解放的民衆却不解放，已經解放的民衆倒又被牠做了試驗品，而受盡不能忍受的苦痛，這只是叫民衆掘自己的墳墓，何嘗是爲民衆開幸福的新路？照第一個批評，共產黨是拐騙民衆的。照第二個批評，牠是施策略，將民衆做工具，還以之戕賊民衆而滅亡社會的。因爲害民衆，害社會，所以歸到第三個批評，牠不能作階級鬥爭，就連農工運動也不能作；牠不能作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就連國民革命也不能作。何況牠把社會國家弄到破產大亂的時候，適足爲軍閥及帝國主義造機會，所以歸到第四個批評，牠的民衆運動，只可說是民衆掘自己墳墓的運動！

經過共產黨的試驗，中國革命的民衆，應該到了覺悟而轉向共產黨掙擊的時期。這兩年

間之，中國民衆經驗了自來未曾有過的經驗，受了自來未曾受過的教訓，如果依照殘忍的唯物史觀的說法，這許是中國民族不可忘記的教訓，然而犧牲也太大了。再檢點民衆運動的成績，可以說完全失敗。經過重大的犧牲，精神上所得的只有痛苦，物質上是毫無成績，中國民氣，目前遂有回復到從前不緊張的那樣傾向。然而共產黨，軍閥，帝國主義，中國民族生存上這三大惡魔，都正在醞釀着新形勢，計畫着壓迫中國和破壞中國的新方式，我們中國民衆是決不容鬆懈下去的。我敢堅決地說，這三大惡勢力不打破，中國民衆便一日不能不集合在三民主義之下作普遍的團結和奮鬥。三民主義本來不只是消極的爲打破這三大惡勢力而設，只是事實上正遇着這三大惡勢力的存在而猖獗，那就證明三民主義越發是打破這三大惡勢力的唯一利器。這不是誇口的說法，歷史的行程是決不會欺人的，大家且耐着心兒看看吧。

二、舍三民主義外無民衆運動的理論

何以三民主義必定是中國民衆運動的基礎呢？這問題有兩種答案：一是從中國實際的需要上來的；一是從各國歷史的教訓上來的。爲容易明瞭起見，我們且先看各國歷史的教訓罷。

歷史是有兩面的：有縱面；有橫面。橫的一面，牠有各種民衆運動的事蹟。拿破崙的時代，在中歐各國有民衆運動，在非洲有回民的宗教運動，同時在歐洲也發生經濟的鬥爭運動。到了現在，各國間的民族運動，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更是同時並起的普遍現象。這一切運動，實在都是民衆運動，因為運動之所以起，乃起於和多數民衆有關的問題，而其所有的目的，乃在解決民衆切身的苦痛。不過各國的民衆運動，有的是為經濟鬥爭，有的是為民權鬥爭，有的是為反抗外力壓迫的運動，而都是各為各的特殊問題而起，各依各的方式進行，而且各照各的預定主張而謀問題的解決，所以各種運動橫的一面沒有連屬，縱的一面沒有相同的步驟，結果往往沒有多大的成績。

從各國歷史上這種種民衆運動事實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它的問題，總括不外三類：一是屬於民族的問題，一是屬於民權的問題，一是屬於民生的問題。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所以有世界歷史的根據，所以備具了適用於世界的特長，都是為此。然而在過去歷史上，各國對於這三類的問題，都是遇着特殊的故事發生了之後，隨時來謀解決，沒有像孫先生這樣博大的眼光和精神，能預先為一個國家定出長治久安的大計畫來。所以各國解決這三類問題，各有各的

歷史因緣，而大抵都犯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毛病，結果連一個大問題都沒有解決。如果再把各國歷史縱的一面看來，我們更可以明白這三類的問題是不能各別的或任從一個來單獨的解決，同時也就可以明瞭我們的民衆運動，爲什麼要以三民主義爲基礎的道理。

英國在歷史因緣上是首先注重民權問題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從十四世紀起，英國的民衆運動，直可以說是由貴族僧侶反抗君權之爭，到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由中產階級反抗貴族僧侶的特權之爭，到近代平民選舉權之爭。英國民衆解決民權問題的方法，就是一貫的要求一個代議制度。他們的歷史彷彿告訴我們道：只要代議制度一鞏固，民權就可逐步的解放出來；只要民權問題有了解決，其他都不是根本問題了。固然，自從代議制度成立以來，英國誠然對於什麼問題似乎都能迎刃而解了。然而英國在歷史上曾經遇着一個宗教和政治相衝突的問題，他的代議民主制就經了百多年而找不出辦法。後來找着一個辦法，叫做「政教分離」，凡是宗教的信仰問題，任個人自由決擇，國家不去干涉，而個人就再也不必把教爭混入政爭。其實所謂「政教分離」，何嘗是什麼辦法？這不過把宗教之爭與政治之爭劈開，而宗教之爭這個問題仍還存在着。這是民權問題解決而其他問題不能解決的一個證

明。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組織大變遷，代議民主制就更遇着困難。國會是要有大多數議員贊同一種政策，才能維持政府的，而議員却代表了許多不相同的經濟利益。要維持政府，代表各種不相同的經濟利益的議員，便不能不有種種隨時的新結合。議員一方面是和政黨有密切的關連，一方和社會經濟團體有密切的關連，他們的隨時結合，當然就是政黨間和社會經濟團體間的隨時結合。但這種種種結合，又並非依照階級屬性為標準的。譬如一個主張私有財產權的農民團體，事實上遇有必要，就不能不同一個反對私有財產權的工人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一個資本家的團體；這種結合，不適合於階級經濟的理論可知。即在勞工組合當中，雖然彼此都以同樣的社會主義原則為基礎，而彼此間利益的衝突，往往比勞工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劇烈的多。遇着保護政策提出到國會的時候，棉紗業的工人和織布業的工人間，其鬥爭常常比棉紗工人和棉紗資本家之爭還更凶些。在這種經濟團體交相衝突的情況之下，英國的國會不啻分裂為多少經濟利益互相水火的集團，誰也不能長久地聯合誰，誰也不能長久地分裂誰，但總是合不能好好地統治全國，分不能澈底地改革社會。所謂兩黨制，雖沒有完全僵死，可是代議民主制已不復有兩個以利害感情完全相同為基礎的政黨來運用，而有時時被多少利益

衝突的經濟集團所拆裂的危機。代議民主制是從前許多人認爲可以解決民權問題的，而英國又是代議制的祖國；牠現在被事實證明，是以解決民權問題始，而將以不能解決經濟問題終。但是經濟問題是近代政治問題的中心，經濟問題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也當然不能解決。英國的民主，到了近百年來所以無進步，而只落得一個虛偽而不澈底的民主之批評，其原因就在此。依英國這個歷史的例，我們就可知凡是一個國家，要想單獨解決民權問題，而同時不想解決民生問題，是決不成功的。英國歷史是從民權問題着手的歷史，現在牠却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問題，而且不能澈底解決民權問題，這豈非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有連鎖關係的最大史例麼？

其次，有的國家，其歷史的發展，並非沿着一條解決民權問題的線索而來的，換言之，就是沒有民權發達史的因緣，而一到現在工業發達的時候，各種經濟團體的鬥爭便成了國家的最大問題。奧國就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最好的例證。奧國各種經濟團體是有組織的，所以牠的民衆運動，顯著地是經濟的鬥爭運動。國中各種經濟團體的力量，是勢均力敵的，而在政爭上也就不各不相讓。不消說，奧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是利害不同的經濟團體有組織的長期鬥爭。這種鬥爭，不但資本家與資本家爭，並且勞動者與勞動者爭。因為經濟團體的分野，事實上並

非依階級的差別而分，乃依各項工業相互的利害衝突而分，所以表現在政治上的分野，就更加複雜。一個經濟團體的主張和政策，不能強其他團體的贊同，國家就因之長在各團體相持不下之中，而陷於僵化的政局裏面。這種國家，當然是沒有敏活的進步，所以在國際上尤其要受英法意和國際聯盟的支配了。這一個例，就可以證明凡是一個國家，若任經濟的行程自然發展，到了階級之間不但有衝突，而且同一階級同一職業之間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獨民生問題是不能解決，就是民族問題也無法解決；可知民生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是互相連帶的，要解決這個，就決不能拋棄那個。

站在歷史的總樞紐上觀察現在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如果單獨把權給與人民，把富給與幾個資本家，這種國家是不能稱為民主的；一個國家，把富和權都只給與少數人，而大多數人却一無所有，這種國家是決不能存在的；如果少數國家，對內把政治不平和經濟不平的爭端解決，對外却強人忍受政治不平等和經濟不平等的壓迫，這種國家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罪人。現在的世界現象，正是如此，可見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今日世界的三個連環問題。將這三個連環的問題縮小到一個人的生存上說，就是人不能有財產而無自治權，也不能有自治

權而無財產權，更不能有自治權和財產權就自視若天之驕子，而施壓迫於他人。倡無治主義者，理想在於破個人之被治，而心裏何嘗否認個人之自治；主張廢除私有財產制者，理想在於破除支配他人之財產，而心裏何嘗否認財產之享用；主張國際主義者，理想在於破除統治他民族的強權，而心裏亦何嘗否認各民族之自治？苟明此義，則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實人類全體的問題，也就是個個人的切身問題。在這三大問題不能同時解決的社會當中，個個人便都有發起或參加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必要！

這是根據世界歷史的教訓所下的斷案，然而再看我們中國自己的實禍，這三個切身問題，尤其是急迫多了。孫中山先生早已和我們說過：中國民族所有的禍害，一是受列強人口增加的壓迫，一是受外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受外國經濟的壓迫。這三種壓迫，不是僅僅一小部分中國人受的，也不是一大部分中國人受的，而是全中國人受的。全中國人切身的三個大問題，就在此。我們受外國帝國主義這三種壓迫之外，再加上民心渙散，沒有抵抗強暴的團結和能力，是自己第一種積弱；帝政遺毒，流爲軍閥，竊奪國家政權來塗炭生靈，而人民却不但沒有管理國家事業的權力，並且沒有抵抗軍閥的能力，是自己第二種積弱；機器發明了幾百年，而我們還是

生產落後，天然的富藏，自己不知享用，而任人佔取得去做吸收中國人血汗的資料，弄到一種全國皆窮的景况，是自己第三種積弱。這三種積弱是內部的，那三種壓迫是外來的。內外的禍害兩兩比合攏來，便成爲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個總問題。所以我們中國的需要是馬上就須得解決這三個總問題，否則，國要亡，種要滅，到了那時，四萬萬人是要同歸於盡，決不能倖免的。

但是我們要解決全國民衆人人有切身關係的三大問題，我們就決不能走各國歷史所走的路。照以前世界歷史所給與的教訓，我們不能像英國那樣只從解決民權問題入手，而不同時解決民族和民生問題；我們更不能像奧國那樣任個人資本生產制度自然的發展，結果就連社會國家都分裂成多少經濟的團體而長相衝突。我們的問題，須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同一計畫中謀整個的解決，這就是說，我們中國民族的自救運動要有整個的解決三個問題的計畫做中心。整個的計畫是什麼，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作用，在於消滅中國外來的三種壓迫和內部的三種積弱。詳言之，民族主義，在打破外來的人口壓迫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而恢復中國民族獨立自由的地位和權能；民權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和軍閥兩種政治的掠奪，而建立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政事的一個國家，使人人都有自保自養的能力和

機會；民生主義，在打破帝國主義軍閥及其他特權者的剝削，而以國家的力量來扶植生產交通事業的發達，以滿足人民衣食住行的四大需要。孫先生的建國大綱，更把三民主義具體的表現出來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畫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其次為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舉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其三為民族，故對於國內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國際平等國家獨立。」在這三民主義的具體方案之中，孫先生完全沒有為什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一類的特權階級預留餘地，而只有純粹的為民衆的福利打算。所以三民主義，就其作用說，實在是唯民主義；衣食住行的需要為民而謀，政治知識和權能的需要為民而謀，國際平等獨立地位的需要亦無不為民而謀。我們民衆除了這三大需要而外，還有什麼更切身而更急迫的需要呢？我們四萬萬人所受的壓迫，可以總括在一句話裏面，就是受着這三種需要的窮乏的壓迫。在這一種總壓迫之下，我們的民衆運動，當然是為反抗這個總壓迫而奮起，而進行，而非達

到目的不止。以世界各國的民衆運動的歷史比較起來說，我們的民衆不是要像英國只一貫的做了民權運動，也不是要像奧國只等到資本生產出了毛病纔來做紛亂的經濟鬥爭運動；換言之，我們做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民族運動政治運動經濟運動三種合而爲一的運動，而其所以必須合而爲一的原因，是事實上中國的地位民衆的苦痛所決定的，而非任何人空想所決定的。再比照一切民衆的原則來說，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是備具了永久的可能性，是社會生存的唯一利器，而且是備具了成功的條件。如果真實依照三民主義目的來作民衆運動，除却一切個人的錯誤和缺點外，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決不會使民衆受欺騙而失望，決不會使信仰不一致而組織上起分裂。過去民衆運動失敗的反證，世界歷史的教訓，和國家實際的需要，在在都肯定了，唯三民主義纔是民衆運動的基礎，亦唯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纔是真切的民衆運動，無論何種阻力，都不能防止其成功。

三、民衆運動的三大程序

根據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有整個解決的必要，和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的原則，我們既然明瞭民衆運動必須以三民主義爲基礎，那末民衆運動就非依據三民主義而定出

整個的進行計畫不可。由此要點，遂產生一個根本原則，就是：

三民主義之實現，必須依總理手定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程序，在此三程序中，革命政府和民衆運動必須相互的密切的聯合一致以並進；此其要義，蓋在舉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團結爲一種大力量，而急速的完成破壞和建設雙方的工作；但在國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之間，其所賴以溝通雙方團結爲一個整個大力量者，必須忠實健全的中國國民黨，故黨必須一方爲民衆團體的訓練指導，使其能自由對於國家社會問題表現其意思，貢獻其能力，一方爲政府的監督指揮，使其扶助民衆相互的利益，其權力得爲民衆的權力，其政策得爲民衆謀福利的政策。

基此根本原則，我們且將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革命期內民衆運動的方針，定明其概要如左：

一、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方面用革命的武力掃除國內的障礙，黨的民衆運動一方面必須派訓練成熟的人員到各縣指導民衆，做三種主要工作：（一）協助革命的武力；（二）訓導民衆團體之組織及其發展；（三）宣傳革命的主義和軍政時期的革命政策；

二、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為訓政開始之時，在此時期，黨的民衆運動，必須備具大規模的計畫，為建設的訓練，率導人民依照建國大綱的訓政實業計畫，而扶助其使用直接民權及解決民生問題的知識和能力之發達，以協助各縣自治基礎的創立；尤當注意的，就是在此期內的民衆運動，對於本省訓政基礎之確立與全國軍政統一之促進，兩種工作必須兼顧，而尤其對於民衆的訓政工作與政府的訓政方法保持密切的調協；

三、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為一省憲政開始時期，全國有過半數省分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為制定全國憲法時期，在此期內，民衆運動之目的，在於完全養成民衆運用直接民權和參預國家政權的自動能力，宣傳訓政憲政兩期內的成績，以求五權憲法和直接民權在實際運用上收完滿的效果，同時對於民生主義的具體建設，必須使人民與政府協力共謀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之大規模的進行。

這三時期民衆運動的方針，我們更可詳細說明其內容。第一、軍政時期，民衆運動必須確立於集合全國人民的力量以掃除障礙之基礎上，故除以革命的武力奠定新國家以外交方式廢除不平等條約外，必須以政治法律的力量規定公共的度量權衡及一切法令，禁止阻礙改革

的惡制度和惡風俗如釐卡陋規苛捐雜稅販賣人口等；保護民衆團體組織的自由；製定訓練民衆團體的方法；防止高利盤剝的壓迫民衆及階級鬥爭的行動；禁止引誘或脅迫民衆團體離開黨與政府的指導訓練而破壞革命之進行；確定民衆團體在地方的基本組織之完成，以植訓政時期縣自治的基礎，其在基本組織未臻完善以前，非得黨與政府之認可，民衆團體即不得任意組織上級機關以免奸人截斷民衆樹立民主的自治之根基而利用之以爲破壞革命的工具；而尤須解除非屬於革命武力系統之一切武裝，使民衆完全受革命的武力之保護，庶不復有共產黨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挾武裝以魚肉地方人民的危險。總括的說，軍政時期的民衆運動，在於確立民衆團體的組織，以爲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之基礎，協助革命武力的破壞工作，而防制任何惡勢力破壞革命之進展。第二、破壞工作完成，須接着開始做建設工作，所以訓政時期的民衆運動，須養成民衆使用直接民權的知識和能力，扶植其使用科學方法以改進各階級民衆的生產，而增加其購買力，調查地方人口及農工業的實況，贊助生產和消費合作事業，測量縣市的土地，整理農田經界，以爲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準備，改革地方的警察衛生及農村工廠衛生等，使民衆直接享受社會生活的實際利益。故此時期民衆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培植社會的基礎，使

民衆的保和養兩件大事得以由鞏固而趨於發達，纔能直接進於國家大建設的憲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民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實力已有基礎，國家就可進而實施三民主義的大計畫，如五權憲法的頒布，和實業計畫的施行等。這時候民衆運動完全要以民衆已經行使熟練的民權和已經樹立基礎的經濟能力，促進國家建設各大計畫之實施。凡土地生產力的增加，鑛產的開發，交通的建設，水力的利用，及育幼養老濟貧救災等項大規模的公共事業，都須民衆督促政府，合國家與人民之力共同進行。總合言之，此三時期民衆運動，在第一期爲破壞惡勢力，在第二期爲確立新社會的根基；在第三期爲完成國家的建設；三者分言之必須步驟不亂，合言之必須精神一貫，而每一時期的進行，必須民衆與政府一致，政府與民衆一致，然後民衆運動纔不失爲三民主義的運動，纔能步步取得不可磨滅的成功。

我們從這三個時期的方針和內容裏面，可以看得出中國民衆運動，決沒有適用階級鬥爭理論之餘地。我們首先看軍政時期，其革命目的，在掃除國內障礙，換言之，即掃除帝國主義軍閥和社會固有的惡制度惡習慣。這種種惡勢力是全體人民不分階級的公敵。在掃除一切惡勢力時，決不容人民分裂爲兩個對壘的階級以自相殘害，而轉爲帝國主義軍閥所乘。要曉

得階級鬥爭的作用，在於把已成的資本制度的社會拆成碎片，造成大紛亂，而非集中社會的力量來革命的。我們中國的惡勢力，非資本制度從社會內部長成起來的，是一方面帝國主義由外壓迫過來和國內舊日封建社會沒落後騷亂起來的，所以中國革命所取的方式，不是把已成的社會根本搗碎，是把已碎的社會根本改造，不是把社會的力量拆散，是把社會的力量集中。階級鬥爭的社會，它的社會是反革命的，只有少數人是革命的，所以拆散社會就是革命；我們中國現在既貧且弱，生存之機日微，所以社會是革命的，只有最少數人是反革命的，所以集中社會力量，就是集中革命力量，而拆散社會力量便是反革命。因此之故，階級革命的口號只是喊「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實際上無產階級聯合又只是工人的聯合，而我們中國革命，就一定要喊「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而各階級聯合且具有整個社會結合在革命線上的趨向。我們不能一方面喊着「各階級革命分子聯合起來」，一方面又把社會力量搗散，更不能一方面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一方面又叫農工陷入階級鬥爭的空途而破壞正在建設的國家。明白了這個要義，我們可以站在三民主義的民衆運動的立場，把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作一個較深切的批評。

四、階級鬥爭的民衆運動之批評

依階級革命的理論，只有工人可以革命，因為它們受着資本階級的壓迫。既然只有工人可以革命，所以唯有工人纔是革命的主力軍，而農民不過只能做同盟者。從這一個原則裏面，我們可以首先注意階級革命的理論，一開始已陷在一個很狹小的立場，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事實上已受了限制，——限於工人階級。既然以工人爲主力軍，以農民爲同盟者，於是民衆運動就全然依此目的進行，換言之，舍工農運動外，便無運動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和列寧可謂大體是一致的，都認定農民是爲別一個階級的同盟者。然而精密地研究起來，馬克思和列寧兩人乃大不相同。馬克思的理論是：大農經營是優越的，資本一到農村，其結果與城市資本一樣，釀成兩個對壘的階級，一方是大地主之成形，一方是中農小農之瓦解或沒落。他推測客觀的事實如此，所以他對於大農主張防制，對於中農却無主張，對於小農只說是「自然會沒落。」法國馬克思派社會黨曾有保護小農的主張，而恩格斯就說：「我們對小農既不應該說促其消滅，也不要說保護他。」可知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根本上認定了中農小農是自然會沒落的，而其沒落就必定是農業自然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的結果。要防止大地主，馬克思在共產

宣言裏面就提出了四個政策：（一）廢止土地私有，以地租充國費；（二）以共同計畫，改良開墾土地；（三）編成產業軍，尤其對於農業；（四）將農業工業的經營結合起來，漸次消除都市和農村的區別。從這四個政策上，我們知道馬克思的目的，乃在將農產業和工業做到一基礎上面——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面——而農民都變成工人，至是都會和農村的區別也消滅了。至於列寧，他所有的對象，是俄國的特殊實情。俄國貴族就是大地主，而同時工業尙未發達，沒有西歐那種大資本侵入農村的現象；所以他的農業政策，乃分爲三個時期：（一）在開始革命時期，主張土地農有，目的在引動農民贊助革命；（二）農民得了土地，便發生小資產階級意識，這時候就須使農民中立，換言之，就是使農民失却與工人同盟之地位；（三）到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對中農仍使之復爲工人的同盟者。這時候，蘇俄就由國家給以幫助使合作社發達於農村，引農民向社會主義的建設之路。

馬克思和列寧不同之點在哪裏呢？

就上述兩人的思想和政策說，彼此不同之點有三。

第一，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和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有別。蘇俄的農民階級與無產階級聯合在一起，對帝制和資本階級作戰，因無產階級革命而得土地和自由，所以牠是做無產階

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列寧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做無產階級的預備軍。這一種農民階級，和馬克思所指的在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之間，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聯合在一起作戰，從資產階級而得土地，做資產階級預備軍的農民階級，當然是大不相同。馬克思所謂農民階級同盟，就是客觀事實上認定農民階級做了資產階級的預備軍，而農業之發達，一定是大資本侵入農村，大地主之成形，和中小農階級之沒落。第二，蘇俄的農業和西歐的農業，也有區別。在西歐，農業發達，是依資本主義通常的軌道，一方面是巨大的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巨大地主，一方面是在貧困窮乏及所謂賃銀奴隸極顯著的分化種種關係之下，完成所有的農業。馬克思以這種事實做背景，所以他推斷農民階級衰頹沒落，全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蘇俄的事情却不同，農業因蘇維埃政權成立，和重要生產方法之國有化，阻止了西歐這樣的發達，所以就不得不另闢途徑。所謂另闢途徑的方法，就是列寧的合作計畫。史丹林在他去年出版的「列寧主義是什麼」一書裏面，曾扼要的說明他的合作計畫之目的：「幾百萬中小農民的合作組織，由國家給之以有利的信用而得以支持的合作社，便發達於農村。我們的農業新途徑，乃由合作社引多數農民而趨於社會主義之建設。以集合主義的原則徐徐施諸農業，即先侵到農業的販路

方面，次侵到農產的生產方面。……販路的合作組織化，經濟配給的合作組織化，以及農業的信用和生產的合作組織化，是農村幸福向上的唯一途徑，從貧困零落中救出農民羣衆的惟一手段。」史丹林解釋列寧這種合作計畫，先以蘇俄國營工業的社會主義的性質爲前提，以表示蘇俄合作社之性質不同於他國，遂謂列寧的合作制爲合理，然而合作制不能到共產主義，列寧派自己也會承認過的。這且不說，我們所應該注意的，還要看馬克思和列寧的農業政策的異點。第三將列寧的政策與馬克思的比較，就曉得馬克思以爲西歐農民階級自然會沒落，所以他的政策，意在幫助這種沒落的傾向，而消滅農村和都市的差別，而列寧則並不作如此想，所以他還極力用國家的力量，施行農業方面的合作社組織化。將這三個異點下批評，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的城市資本集中和中產階級沒落的原則，事實上已經不是如此，但還說得像；至於以這一個原則推斷農村階級對壘和中小農階級沒落，現在事實上簡直說不上了，而列寧採用大規模合作組織於農業，也就是並不認定農民階級有沒落趨向的反證。然而列寧的土地農有和合作組織化的政策，一個是意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個是意在引農民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預備軍，總言之，就是以農民爲工具罷了。

因爲馬克思和列寧的政策不同，理論上就包藏了爭點。列寧死後，托羅茨基，辛諾維耶夫，加米尼夫三人因此就和史丹林起了大爭論。托氏一派，主張估量大農的力量，課以重稅，以打消他的過剩的力量，對中農使他中立，對小農就予以幫助。史氏一派就反駁說：你們估量大農力量過大；我們對中農不只要他中立，兼要和他同盟；對於小農，在國家力量不穀的時候，不應該去挑撥他。托氏一派，當然是懂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然而史氏一派却完全守着列寧的革命策略，並且引證列寧的三個時期的農民政策，只是引中農爲同盟，對小農就無幫助。我們對於馬克思派和列寧派的農民政策，可以簡括的更下兩個批評：第一、農民爲工人同盟者的策略，在打破封建土地制的俄國還比較行得通，在封建土地制沒落了許久的國家，尤其在以農業生產爲主的國家，就還不穀，其所以不穀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只是政治上的策略，而非純粹爲農民幸福打算的社會政策；第二、農工同盟，如果不能朝消除都市和農村區別的方向走，或事實上不能到那種步地，則所謂「中立」「同盟」簡直是爲握政權者利用操縱的代名，於農民實際毫無半點利益和進步，這是俄國現在農民的實況，在在可以證明的。

中國共產黨在兩湖所用的農民運動的政策，就更不成話。總括的說，他們是運動地痞流氓，

而不運動農民，更不是農民運動。他們說是叫貧農與佃農爭鬥，佃農與自耕農爭鬥，自耕農與小地主爭鬥，小地主與中地主爭鬥，中地主與大地主爭鬥，實際就是地痞流氓把農業社會完全搗成粉碎，在這種情形之下，哪裏還有什麼界限分明的某種農民與某種農民的種種鬥爭呢？他們說是給農民以實際利益，而着手於米價的規定，初則規定「不得過二元半」，後來又規定「不得過二元」，實際則社會被搗亂，米價只會一天一天的增高，而空文的規定，是決無補於事實的，何況米價定低，其他商品市價增高，農民更是吃虧不小呢？本來農產品消售問題，在俄國共產黨是很注意的。在十月革命前，大農受政府的徵發，而結果便是農民不願多生產。在施行新經濟政策後，蘇俄便設政府式的合作社，代農民買賣農產品，結果雖然可以稍稍增加全國農產的總量，爲而事實上仍是中農小農吃虧。這些都不必說了，我們所應該注意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簡直是俄國共產黨施諸中國的策略。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老早說過，他們向歐洲進攻的五條戰線，都已失敗，唯有向中國進攻的一條戰線是有多少把握的；所謂有把握者，即看中了中國農民，可以挑動起來大搗亂。鮑羅庭一到中國，就不願有各種勞動法，不贊成合作社，而只要提出土地農有的口號，其理由都因勞動法和合作社於CP搗亂不方便，而土

地農有，挑動農民棄耕作而起騷動，是於C P搗亂最利便的。布哈林現在却更明瞭中國的情形，所以就主張在中國只要提出「減租」一個口號來，就有辦法。有人反駁他說：「減租豈不是要大大的減少國家的收入嗎？」布哈林說：「對呀，國家不能減收入，農民纔好反抗國家呀！」又有人駁他說：「減了田租，工價便越增高，豈不是農民更苦麼？」布哈林說：「這都不錯，但唯其如此，就好叫農民反對資本家呀！」這就可見他們的策略，是要提出極不合經濟原理的簡單口號，同是又是羣衆不能理解但覺極合感情的，叫民衆向走不通的方向去硬撞，撞不通了便歸罪於共產黨所要打倒的國家和階級身上，好激起更擴大的騷亂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在工人當中和在農民當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如此。

孫總理的農業政策又是怎樣呢？概括地說，他的政策，理論是純然以農業社會主義爲原則，而具體方案是完全適合於中國的實際情形；所以他主張「平均地權」是對於城市土地預料其地價必日見增高，而以高率的稅額及國家收買兩個方法以截斷大地主的發生，同時主張「耕者有其田」就是對於田價必欲使其平，庶幾農民易獲安定的生活，而城市工人自願改業者，亦可退而業農；這也就可知孫總理注重農民問題的精神了。但是總理的政策，是要以

國家的力量去幫助農民，而不是以國家的力量去搗亂農民。以國家力量幫助農民，則就中國實情而論，只要國民革命經過軍政程序，政府保障耕者有其田，並設農民銀行以便其低利率之借助，而免土豪劣紳之高利貸，設合作社以便其農產品之銷售，而免奸商之操縱盤剝，開發水利，以便其灌溉，而免天然之災害，資以科學知識以利其農具之改良和肥料之利用，而促進其產額之增加，如此，農民的福利也就可以增進，哪裏用得着共產黨搗亂的方法呢？列寧實行土地農有的政策，在原則上原亦與耕者有其田同一理想，但在策略上却全不如此，因為他的目的在引動農民來革命，一方固然要打破俄國貴族的大地主，一方也要使農民來把波希維克推上政臺。等到他握了政權，他就說農民得了土地，有小資產階級意識，又把農民來挑撥拆散，使之永無反抗波希維克的力量。有人曾經批評列寧，說他「土地農有」政策，實在是違反廢除私有財產的原則，因為把田分給農民，就是使人各有產。列寧就說：「你却不知道取得農民在政治上是若何的重要；我們失了共產主義的原理，却得了大多數的農民呀！」可知列寧式的農民運動，全然是重在政治作用，並非重在經濟理論；此與布哈林的減租革命論，同是不講經濟原則的證明。這種農民政策，目的不過為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手段，全然是利己主義，也就是害農主義，與

我們 總理唯民主主義的農民政策，相差真不知有幾萬里程途。

依以上的批評，我們就明瞭共產黨和國民黨民衆運動的區別了。共產黨的農工羣衆運動，顯然只是爲C P爭奪政權的工具，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在農工兩方面，都是要造成全國的經濟組織之發展。我們總要從毫無健全社會組織的紛亂國家裏，把民衆引上三民主義之路，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程序，使民衆由社會組織化，進而爲政治的自治組織化，由政治的自治組織化，進而爲經濟的組織化，乃至使民衆組織同時備具社會政治經濟三種性質的基礎，中國纔有鞏固發達的希望。總結的說來，三民主義是唯民主主義，民衆運動是要三民主義自民實現的；共產黨沒有真實爲民衆而謀的主義，只有奪取政權的策略，它的民衆運動是要拿民衆做工具，而爲它奪取政權的犧牲品的。唯民主主義的革命，是革命黨自己犧牲去換取革命的成功，而以利益付之民衆；共產黨的革命，是要引動民衆去犧牲，換取革命成功的利益，是要歸之共產黨的。共產黨的革命成功，只有黨是成功，而民衆是犧牲了一部分，所剩的一部分，縱使大亂之餘能夠共一點現成的產，也是有限。國民黨的革命成了功，黨的損失必大，然而民衆却能站起來行使自己的權能，同在三民主義下獲得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利益，而其所獲的利益，

是創造新的，不是瓜分現有的。有人曾經批評過俄國共產主義說：「現有的經濟的生產，就是收到國家手裏來重新分配，縱使分得平均，人民也所得無幾，必須要從新造產來分配，人民纔所得無窮。」所以孫總理說他的民生主義是造產的，「是要共將來，不是要共現在，」其所含的真理，實不僅僅施之於中國實際情形而適合，乃放之世界而皆準的。由此一義，也就可以區別共產黨的民衆運動，是困在現狀裏面混戰的，而國民黨的民衆運動，是引向未來新社會創造的。中國革命的民衆，努力向三民主義的創造之路來啊！

青年的煩悶與出路

現今的青年都感着煩悶，尤其是覺悟的青年越感到煩悶。

煩悶的來由，固然有種種；政治的不清明，社會的不安寧，都直接間接給青年以重大的刺激。但這都不過是激刺罷了，還不是煩悶的總因。總因是：青年正在生理的發育最緊張的時期，血氣是剛強的，筋肉是飽滿的，天機是活潑的；他的生理的發育，使他時時刻刻起種種的衝動，而這些衝動是無目的的，無惡意的，無選擇的。簡單言之，他的生理上的要求，只是使他好動而惡靜，只要給他滿足了，就可算得是「得遂其生」；如果遇着環境的障礙，給他一個不滿足，他使不

知不覺的起了心理的煩悶。心理的煩悶一起，他便不知不覺的埋怨一切的環境，詛咒一切的制度和習慣。我並不是說一切環境都是好的，更不是說一切制度習慣都是對的，我所着重的是：如果我們分析青年生理上的發育現象，就可以解釋他心理上的煩悶；從他心理上的煩悶，就可以解釋他對於一切環境的不滿。

因為青年的生理發育最緊張，於是他的慾望也最亢進。就中國一般青年說，他們最普通的慾望有四種：（一）求知慾；（二）性慾；（三）佔有慾；（四）支配慾。這四種慾望，佔領着青年全部，而且支配着青年的全部人生觀。在舊社會的環境尙沒有改造成功的中國，青年這四種慾望不能滿足，是毫無疑義的。不能滿足，便起煩悶，所以現在中國青年最感煩悶的切身問題，就是：一、讀書問題。青年的求知慾是強烈的，讀書當然是求知慾必然的結果。有時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簡直佔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把支配慾佔有慾性慾問題都暫且擱開，首先為謀滿足求知慾而讀書的，這種實例倒是很多。好些青年，在求知慾最高的時候，爲了讀書，竟可以犧牲了戀愛，這種實例也不少。前幾年家庭問題鬧得最凶的時候，青年往往因爲要求婚姻自由，幾乎人人都要和家庭翻臉，而同時却有多少人並沒有和家庭翻臉的，其原因就是「爲了讀

書，不得不要家裏的錢；要它的錢，就只好服從它；要服從它，就只好犧牲了婚姻自由權。」這種青年便是爲了要讀書而情願犧牲戀愛自由的。有人以爲這是一種缺乏奮鬥精神的青年，實在是冤枉了他。求知慾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慾，既然都是青年的慾望，而事實上又不能同時滿足，那自然就有一個先後緩急之分。求知慾比較強的青年，犧牲了婚姻自由，抑制了佔有慾，甚至忍受家庭無理的支配，而求達到讀書的目的，這豈是缺乏奮鬥精神所能做得來的嗎？凡是奮鬥，都要忍受幾方面的犧牲，而達到一方面的目的，都要忍受許多的缺憾而滿足一個急切的需要。在青年心目中，有時讀書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戀愛問題比任何問題佔的地位都高，有時讀書戀愛都不覺重要，而求活動求事業的問題反佔重要的地位，這都是隨着各人生理發育的程序和特性而差異的。當讀書問題在青年心目中比戀愛問題還覺重要的時候，失學的痛苦也許不減於失戀吧。所以我們只看青年在戀愛上努力而忍受了種種痛苦，或只看他在讀書上努力而忍受了痛苦，只看他的一面的努力而稱許他能奮鬥，或只看他的一面的忍受苦痛而批評他不能奮鬥，都不是對於青年合理的態度。我總認爲青年是生理發育最旺盛的時候，如果他生理上是健全的，沒有先天的缺點和後天的殘廢，他一定是能夠奮鬥的。

所以問題並不在那個青年能奮鬥，那個青年不能奮鬥，而在如何發展他的天性和能力。青年要求在讀書上面來發展他的天性和能力時，只怕誰都要承認他是正當的吧。可是在中國現狀之下，青年要讀書，便要遇着種種困難，種種障礙。大多數青年，困於窮乏，不能求學和不能升學的，固是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少數不受經濟壓迫得升學的青年，又擾於社會的不安，和政治的紛亂，不能安心求學。只看幾年來全國的大中小學，不是因為無錢停閉，便是因為欠薪罷課，不然就是因外交上的慘案罷課，再不然就因內戰陡起，交通阻隔，學生困在家園不能返校，或是學校受戰事影響不能開課。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教熱心求學的青年如何能不煩悶呢？

二、戀愛問題 性慾是本能之一。儒家說：「食色性也，」性慾與食慾並舉，實是一語破的。

何況青年在血氣剛強的時候，色情的衝動，本來只有盲目的要求，那有自制的能力？而且在中國因為一向把未成婚的男女關係，用「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約束得很嚴，就是男女婚姻，一向都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縱有怨偶，大家也歸之於天命以自慰，所以幾千年來，社會只把性愛納諸禮教的約束當中，却沒有成爲什麼大了不得的問題。自從自由結婚的思潮流入中國，愛倫凱結婚必基於戀愛的話深入青年人的心，又因少數青年研究介紹西洋文學的結果，

使一般青年都沉醉於戀愛的迷夢中，性愛問題便成了青年切身嚴重的問題了。這些青年人所接受，所信仰，所沉醉的一切，都是和中國一向的風俗習慣相背謬的。你要自由，老習慣叫你服從父母；你要結婚先有戀愛，舊風俗說，男女是授受不親的。社會既沒有承認男女的交際爲正當，青年人自然很難得有自由選擇配偶的機會。意中人尋不着，青年人是照例要發生「何處是我的歸宿」的悲哀的。就是偶然給你遇見了一個戀愛的對象，還怕是你自己害單思。即使有了雙思的條件，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弄情」，英語所謂 *love making*，彼此都有願爲配偶的時候，又許有家庭社會或其他無可奈何的障礙不容你們結合在一起。不少的青年人或許衝破了一切家庭社會的藩籬，老實做了舊風俗習慣的公敵，又往往遇着自由戀愛的毛病，結果爲求自由反而得着不自由。所以現在的青年，爲了性愛，跟着舊禮教走的，固然有煩悶，隨着新思想走的，也還是不自由。這就是因爲太不自由，和太自由，都會生出不自由的同樣結果。由這一個同樣的結果，所生的煩悶，現今的青年，有幾個沒有經驗過的呢？

三、經濟獨立問題 這幾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女子的經濟獨立問題，成了婦女解放問題的中心論點，而青年男子的經濟獨立問題，倒反沒有人注意。其實中國民族的生存問題

當中，青年不能獨立謀生存，這個問題如果不是比女子謀生存的問題更佔重要地位，至少也應二者一樣的注重。一般人的下意識底下，只以為青年是受了教育的，有了相當的學問就自然謀生有路，所以就漠視了這一個問題。然而事實上青年所感受經濟不能獨立的痛苦，已經成了普遍的現象。青年入學的時候，幾乎沒有幾人不聽着他家裏發出一種「不能擔負學費」的哀聲。好容易湊得一年半載的學費給他上學去了，而家裏還要焦着心腸，給他籌下學期的學費。家裏既然如此的過了今日又愁明日，他到了學校裏想想家裏的窘狀，也是憂多於喜，那裏還能安心求學？這是一般家庭的窮乏，已足以引起青年心裏的煩懣了。進了一個學校，甚至得了升學的好運，他自己還須得憂慮，因為究竟畢業之後，他是否能夠獨立謀生，還是一個沒有把握的問題。就一般的現狀看來，中國現在的學校，是不能給學生以獨立謀生的技能的。教育的失敗，便是青年謀生的最大障礙。不幸中之幸的，全是我們社會的人才同時最感缺乏，所以畢業後的青年，多少還能遇着不被社會事業所遺棄的機會。然而因為沒有真實技能，或有真實技能而遭遺棄的，這種青年尤佔大多數。青年們的佔有慾是最強烈的，但是經家庭的窮迫，教育的不健全，和社會的不接受，他們的佔有慾就完全陷於失望的境地。由這種失望而

生的煩悶，在二十五歲以上的青年當中，比任何煩悶都實在嚴重得多。

四、事業問題 青年要做成一件事業的心理，大抵起於支配慾的居多。但是我們這裏所當分別的有三點。其一，求知慾和性慾，佔有慾和支配慾，都是社會的遺傳，換言之，就是得諸模倣社會的習慣或環境的傳染。其二，這四種慾，在作用上都是交相連結的，不易分開的，所以青年的一種慾活動時，其他三種慾也常常夾在一起活動的。譬如戀愛時，支配慾和佔有慾都會跟着性慾一起活動的，這就是明證。其三，支配慾固然是和其他三種慾相通，但是如果經過健全的教育的訓練和改造，沒有良善社會組織的扶持和國家的利導，則只能成爲自私自利的支配慾而已。青年的事業，本來要基於創造慾，才不至落到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因爲創造慾發展的結果，如發明家，科學家，純然是利他的，是服務人羣的，是不希冀報酬的。但是在中國幾乎沒有教育沒有社會組織沒有國家建設的現狀之下，只能使青年發展支配慾而不發展創造慾。不能發展創造慾，就是民族建設的力量要衰落下去，而他方面支配慾發展的弊害，不是因爲不能作出正當事業而起煩悶，便是因爲失了一切藩籬而衝成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這兩種弊害，都不是民族生存上的良好現象；深切言之，其不良足以陷中國民族於絕望。眼前中

國個人主義的普遍，引起社會的紛亂和煩悶已經不少；這種紛亂和煩悶，可以說得是個人主義者的支配慾成功的結果，和那些作不出正當事業的青年由支配慾失敗而生的煩悶結果，完全沒有兩樣。所以中國現在的青年，因為不是發展創造慾，而是發展支配慾，在事業上便生出兩種結果：（一）支配慾成功，便是個人主義；（二）支配慾失敗，便是消極主義；二者都歸結到社會和個人的煩悶。

青年們爲了這四個問題，都陷於煩悶當中；這個時候，於是有許多人爲他們說法。總合這幾年一般人對於青年的態度，約不外三種：（一）禁慾主義；（二）縱慾主義；（三）三民主義。其他出入於三種態度之間而無系統的主張的，我們可以略而不論。

（一）禁慾主義者說：青年們好地去讀書吧；讀書就是你們的出路，讀書你們就可以忘記了煩悶，讀書你們就可以得到了無限的安慰。求足了學問，你們就可以謀生，可以作事，可以得到愛妻，可以改造社會。所以你們一定不要性急，求學的時候，只管求學，其他一切問題等你們有了學問再來管罷。這一派人的話，表面似乎把青年一切煩悶都信託於書，讓青年到書本子中去慢慢尋求解決，然而心裏却主張青年人是不應該談自由戀愛的，不應該憂慮將來經濟

不獨立的，而且不應該憂慮將來沒有事做的；青年人所應該做的只有讀書一件事。試想青年們的感覺是靈敏的，天性是活潑的，感情是亢烈的，叫他們耐着心腸去讀書，就行了嗎？學校裏所教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有進步的老教科書，所講的終是這麼幾個沒長進的老教員，所講的終是這麼幾本沒改變的舊講義。有些青年聽了禁慾主義派的教誨，書自然會讀的不少，可是人却是越讀越糊塗了，漸漸地只認識這麼幾本老教科書，只聽到這麼幾篇舊講演，而不知世界的形勢社會的變遷了。讀文學的只知有風花雪月，讀哲學的只知有唯心唯物了。這條路是走不通的，汨沒了性靈，還要不認得世界和社會的實際，多數青年終於會有一天忍不住外來的刺激，禁不起心頭的煩悶，而不能不走向別方的。

(二) 於是縱慾主義者就說：青年們來吧，來革命吧，讀什麼書呢？現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不是讀書的時候了；而且，讀多了書，就會變成反革命。智識階級多數是反革命的。我們革命，還要打倒智識階級哩！本來，讀書可以滿足青年的求知慾的。縱慾主義的共產黨深知中國的教育制度不能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且深知青年的慾望是什麼，所以就拿出一套足以麻醉青年的法寶，向青年工作起來。它的法寶是什麼呢？第一件，叫做誇大狂。青年的求知

慾，是帶着一個畸形的好奇性的。如果你能滿足他的好奇心，他的求知慾也就可以不向真理的方向發展，而偏向求新奇的方向發展了。共產黨的誇大狂正是引動好奇心的嗎啡針。你要什麼智識呢？共產黨是用不着知識而可以征服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是沒有知識的，但是只要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大革命，就可以造成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了，那還有旁的人敢說我們沒有知識嗎？這一種口調，原來是反乎常理，但唯其反乎常理，才顯得出新奇。有些青年因為長久處在煩悶中，自然容易接受這種新奇誇大的宣傳。他們那裏會想到秀才造反，三年尙且不成，何況不要知識的人，豈能革命呢？又那裏會想到如果真要打倒知識階級，爲什麼共產黨不就先打倒發明這個口號的人呢？俄國大革命後，蘇聯政府規定全國一切機關工廠等的職員月薪，最高的不得過二百三十盧布。但是懸二百三十盧布的月薪，在俄國找不出一個專門人才來管理一個高加索煤油礦，蘇聯政府便不顧法律，却破例每月花了二萬盧布去請了一個美國技師來管理這件利益豐富的事業。這就可證明共產黨一面喊打倒知識階級，一面又要優待知識階級；共產黨這種對着衆人打自己的嘴巴的事實，中國青年們又有幾人知道呢？所以共產黨自己並不是不要知識，只是拿不要知識的口號去放縱青年好

奇的心理，同時也就驅到一般沒知識和懶於求知識的青年人去替它作犧牲。受其欺的，固然得以大大發洩一點好奇心和懶學心，然而欺人的共產黨也就大大發洩它的支配慾了。

尤其狡猾的，就是共產黨的第二件法寶，叫做性交自由。這個法寶的作用，簡直不僅僅可以投合青年的色情狂，並且足以麻醉青年的好奇狂支配狂和佔有狂。什麼裸體遊行，男女同浴，打破廉恥，在事實上雖不必共產黨的青年個個有此舉，然而以此作宣傳的工具，已足以誘惑一般人的好奇心和性愛慾。戴季陶同志前兩年對於施存統張春木的故事，很抱不平，而CP却認為是對於CY男女最妙的辦法。在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和假借孫總理之名的大學當中，更是盡天下男女之奇觀。還有一次一個共產黨員強姦了同黨一個有夫之婦，雙方鬧到黨來審判，而裁判的人只說：「強姦人的固然是幼稚病，但被強姦的也未免思想落後！」所謂幼稚病，所謂思想落後的批評，真是再妙不過。共產黨來到中國，是奉旨犯幼稚病的，儘管強姦有夫之婦，算不上何種罪過，而怕受人思想落後的批評，就可任人強姦。——這一段風流公案的裁判，令人想起在武漢被強姦的多少國民黨員。我相信柳子厚的河間婦人傳，是一篇懺悔的文字，可惜他們都沒有讀過。——中國一般人受了共產黨的渲染，性問題的文字也就越發風

行。就中有個所謂張競生的，竟放着多少事情不去做，却窮年累月去研究這個與有生以俱來的舊題目，而一般人倒以為新奇。這種又幼稚而又思想落後的性狂家，却更遠在別具肺腸的共產黨之下了。或者老實一點說，青年是應該有相當的性智識，然而研究性智識教人懂得衛生和優生也就夠了，何以所研究的又不特與衛生學和優生學的目的無關，並且只會把青年都葬送到肺癆病的窟中呢？只要看那些做共產黨而兼性狂家的人，如蔡和森瞿秋白之流，無產階級專政尙未成功，癆病却已到了第三期。縱使他們把中國青年犧牲了一大半，做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也只怕是癆病鬼專政吧！

末了，共產黨的第三件法寶是捧場，而第四個法寶是收買。青年的支配慾和佔有慾是後天發達的居多；而且青年人最得意的也不過是初出茅廬，懷着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比較還是希望不奢；但是共產黨却盡量地給CY一個超過奢望的捧場和酬報，青年人那得不為所顛倒呢？馮煥章同志告訴我，說陝西的農民協會委員長不過十幾歲。上海工友都知道李立三等都發了大財。陳獨秀不知個中玄機，還在CY開大會時，說「中國的CY不該竟做了CP的工作，」無怪共產黨說他還是右派。共產黨如此激進青年的支配慾和佔有慾，幾個青年人能夠

不入彀中呢？許多人都曉得說：理想中的共產，須得要支配慾和佔有慾低減到消滅的程度，才能實現。現在共產黨却以虛榮和金錢去誘致青年，激進他們的支配慾和佔有慾，這那裏是走朝着共產主義的理想所走的路呢？這一說雖可以顯出共產黨的作偽，然而我們也要看透共產黨所以用虛名厚利去勾引青年，其目的並非推行共產主義，實是要取得民衆，擾亂社會。因為列寧的秘訣是：亂，大亂，才是少數黨徒能夠奪取政權的唯一機會。

總括地說，共產黨的縱慾主義，是要縱好奇慾，縱淫慾，縱名慾，縱利慾；這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出發點，亦無一不是以獸性的個人主義爲歸宿點。縱慾，才能迷惑民衆，迷農人，迷工人，迷青年男女；縱慾，才能生亂，亂人性，亂家庭，亂社會，亂國家，亂世界；這就是共產黨的所謂革命戰術。從重重疊疊的亂當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奪取政權，這便是共產黨的最終目的。爲了共產黨少數人這種主觀的目的，於是生出種種造亂的主觀策略和戰術；爲了要施用主觀的策略和戰術，於是採用了一個投合個人主觀的縱慾主義或快樂主義；結果，無論共產黨成功或失敗，天下人都要生出普遍的主觀的痛苦和悲哀。所以，青年人從禁慾主義中被勾引了出來，却又要死向縱慾主義中去；所謂工具的犧牲，還有過於此的嗎？

以上這一切，都是卑之無甚高論。只是這樣討論下來，我們得了三個主要論點：其一，就是青年的慾望不滿足而起煩悶；其二，就是禁慾主義者不滿足青年的慾望而使青年別尋出路；其三，就是縱慾主義盡量激增青年的慾狂而陷青年於死路。於此，三民主義者，就不能不救救青年了。

(三) 在三民主義者的立場，我不是主張像禁慾主義那樣否認慾的存在，或認其存在而認定凡慾都是惡的，更不是主張像縱慾主義那樣純以利用人們的獸性爲造亂的工具的。其實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二者都是謬誤的，其謬誤可以舉二事來證明。從前孫少侯學佛，坐關三年。他不僅是禁慾，簡直是斷慾。但是他經過坐關之後，在還俗的那一年之中，犯了九個女子。這是他在一個時期性慾獨強的故事，可見凡慾都不是人人平行發展的，而且因爲斷慾，慾反橫決起來了。孔德少時，愛了一個女子，經兩次的求婚，都被拒絕。過了多少時候，她就死了。他因此就將他的愛情升化起來，轉而用於求知，遂造成他的哲學統系，爲社會學的先覺。這又可以證明人生的慾，是可以變移的。三民主義固不否認慾，但是認定慾是隨人不同，慾和慾的發展，其次第不同，其強弱亦復不同。不但如此，慾是可以變移的；譬如以發洩性慾的精神去

求知，以發展支配慾或佔有慾的精神去求創造求發明，這都是合乎今日科學的教育的精神。孫總理說：「古人所謂天理，其實屬於人，所謂人欲，其實屬於天。」又說：「人的本源便是動物，所賦的天性，便有多少動物性質。換句話說，就是人本來是獸，所以帶有多少獸性，人性很少。我們要人類進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類有高尚人格，就在減少獸性，增多人性。沒有獸性，自然不至於作惡。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高尚，所做的事情，當然是向軌道而行，日日求進步。」這段話，就認定人的獸性和人性都可以改造的；慾改造而成理性的進步，理性造就而求社會人類的進步，這才是革命的教育的最高目的。

從禁慾主義和縱慾主義的種種相反的差別當中，還可以看出這兩個主義有一相同的短處，就是二者都是歸結到個人主義。因為禁慾的成功是獨善其身，而其末路便是反動的放縱。至於縱慾主義的成功和失敗，更不必再說了。縱慾禁慾，都是利己。唯三民主義承認凡慾都有其相當的功用，而在乎調理造就之得其道；得其道，就可以利人。總理說：「我們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

生出政治上之不平，此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也。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亦樂而爲之；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以謀他人的幸福。」禁慾主義是消極的利己的，所以成功不過獨善其身，失敗則無補於世亂；反之，縱慾主義如共產黨之所提倡，則簡直是總理所謂「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而「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以返於「民權革命以前之世界」的了。三民主義者却是總理所謂「重於利人者，每每至於犧牲自己……以謀他人的幸福。」三民主義所以提倡利人而反對利己，就是由於觀察過許多歷史的事實，深知人慾是天然的，天然的就原無所謂善惡；由天然而生的人欲，於一個時代適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人欲也就是善，善就是道德；於一個時代有害於社會的生存和需要，則雖天理也是惡，惡就是不道德。所以利己的欲望，如支配慾，佔有慾，放縱起來，便會危害社會的生存，違反羣體生活的需要。然而天然的欲可以造成人爲的理，所以三民主義提倡把利己的慾改造成爲利人的理。依中國現狀的需要，支配慾和佔有慾是要改造的；依生理學衛生學和優生學的指證，性欲是要節制或糾正的；更依我們中國的需要和科學知識的貧乏，求知欲是特別要提高的。總理說：「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有三種：

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爲發明家；後知後覺者爲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爲實行家。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則人類之文明進步，必能一日千里。」總理這一個發明，是他對於人性的觀察社會的建設和國家的建設之總結的一段話。我們看這段話，就可知三民主義對人性是持着一個多元的認識，於教育上是主張依三種人不同的天賦而發展其才能，以供社會人羣的需要，於政治上是要求依三種人的才能組織一個使「此三種人互相爲用，協力進行」的國家，以求發展人類的文化。所以我於此更要拿總理關於平等精義的話來勸告今日的青年和革命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從此以後，要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生理發育正盛的青年們，用不着煩悶吧。只要認識自己的聰明才力，向三民主義求出路，那就一定不會走上禁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絕路和縱慾主義者所給你們的死路了。依三民主義所指示的路徑，在這個革命時代的需要，青年必須要發展他的創造慾；要給一切慾以正當

的出路，也須得以創造慾的發展爲鵠的。分別的說，創造是求知慾的直捷目的。求知須得求於一個時代的需要有關的知識，求足以供一個社會的實用的知識。離開了社會需要和時代的實用，便沒有求知識的意義和價值。前幾年有句很通行的「爲學問而求學」的話，被大家誤解了，反而變成一句反對「求學以致用」的口號。不知當初說這句話的蔡子民先生，因爲看見了中國人一向都是「爲做官而求學」所以才說出「爲學問而求學」這一句話來糾正大家向來的錯誤觀念。他所以要打破向來「爲做官而求學」的觀念，就是因爲這個科舉時代的舊觀念是不適用於現在；歸結起來，他的話何嘗是反對「求學以致用」的呢？可是現在一般縱慾主義者却又把「求學以致用」的話，變爲「不學以求用」的精神。他們不要青年求知識，但要青年求新奇，而是否適用則完全不管。不求知識，專務新奇，便使一般青年們見着極腐敗極復古極陳舊的事物也驚爲新奇。前年鄧演達在俄國見我，拿出了他在德國同幾個不知名的女子合拍的裸體照片，說道：「你看這是多麼文明！」我當時就答道：「你若說是多麼「新奇」，多麼「自然」，多麼「美麗」，或多麼「野蠻」，都還說得上，若說多麼「文明」，則你還比不上牛馬豬狗那樣「文明。」因爲你脫掉衣服，還只是一時的事，而這些獸物簡直是

長期天然的裸體，豈不是照你說，牠們都比你「文明」多了麼？人在古代野蠻的時代，就是沒有穿衣服的，這事原是極古極舊的，而鄧演達反以爲新，以爲文明，這豈不是笑話！這一事，就可以證明共產黨的方法，只是要窒塞青年的理智，使之不辨菽麥，然後才會跟着少數專制階級去指鹿爲馬。照這種辦法，一定會弄到青年們連自動的求新奇的能力也會漸漸汨沒了。因爲共產黨是新式科舉主義者，目的在使民衆閉聰塞明，不知道自身的真實需要，社會的真實需要，所以才採用離開一切做人的需要的新奇品，去迷惑青年的肉眼。這樣，肉眼是迷了，但是智眼也同時塞了。共產黨如果成功，青年又如果弄到這樣地步，中國民衆當中先智先覺者固要絕滅，連後知後覺者也要絕滅，剩下來只有大多數無領導無指揮的不知不覺的愚民，到了這種地步，就是連那當初靠愚民政策成功的少數共產黨專政階級，也要如古代專制皇帝的子孫，一代一代就要退化下去，成爲昏庸頑魯，以至於倒塌，而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更不堪問了。所以，青年們要趕快覺悟，爲求新奇而得的新奇不是學問，離開社會和民族需要的，不是學問；本着民族和社會的需要而創造科學的真理和實用的發明，才是新鮮的學問。青年是可以做先知先覺者，尤其容易做後知後覺者。有了這兩種人，合起聰明才力低下的不知不覺者，共

同努力，我們的民族才有繼續生存的大希望。總理把這個道理曾經反覆的說過：「天下事業的進步……世界上進步的責任，都在三種人的身上……但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才是先知先覺。世界上如果沒有先知先覺，便沒有發起人；如果沒有後知就覺，便有有贊成人；如果沒有不知不覺，便沒有實行的人……所以世界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實行民權，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責任，應該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覺的人要有一分；後知後覺的人要有一分；就是不知不知覺的人也要有一分。」我勸青年們都來頂受。總理這個教訓的洗禮，在三種人當中創造一部分的事業，擇定一個位置呵！

創造慾發展是求知慾的發展，可以明白了。然而所最忌的是創造慾受支配慾和佔有慾的支配。因為創造慾如果不能勝過支配慾和佔有慾，其結果便是個人聰明才力，不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要打破這種個人主義，唯有提高革命的人生觀。劉蘆隱同志在他起草的國民黨的宣傳方略上對於革命者的人生觀有一段話，大意是說：革命者必須這樣認識自己：一切都不是我的所有，我生時不是我要生的，我死時不是我要死的，一切都是社會的，我

的智識是因社會而有，我的才力是因社會而用；要看破我的一切所有，才能成就社會的一切所需。這話真是能夠表現三民主義者的革命人生觀，然而同時也是今日青年應有的人生觀。

因為要有這樣的人生觀的人，才能破一切造成個人主義的私慾，而發展為社會和人類謀公共福利的創造慾。在我們革命者今日所負的建設三民主義的國家責任上，總理已告訴我們，先知先覺的要有一分，後知後覺者要有一分，不知不覺者也要有一分。全民族的人既然都負一分責任，那就在這一個總合的負責救國負責建國的工作當中，還容得個人主義的存在嗎？

然而同時也要知道，三民主義者提倡創造慾之發展，而打破個人主義，並不是對於支配慾佔有慾和性愛慾持禁慾主義，而實是把後面這三種慾通過創造慾的展進之路，而獲得正當的擴大和實現。三民主義，我視為可以稱之為唯民主義。民族主義之目的在民有；民權主義之目的在民生；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全民一切慾望的總擴大和總實現。

個人主義的禁慾固夠不上說到這一個大目的；就是個人主義的縱慾，也倒會破壞這一個大目的。唯有三民主義，對個人主張把一切慾歸到創造慾的發展上面，或把一切慾調理到不妨礙革命工作的限度，然後人人都能對實現三民主義總目的各負一部分創造的責任，三民主義

實現了，則全民族的生存目的也達到了。這樣，就可以說得是：以個人的創造慾，去滿足全民的生存慾。全民生存慾滿足，則其所滿足的，就中自然有人人的慾望的滿足。青年們只要過細把三民主義研究貫通，就曉得三民主義的社會，人人是有權的，人人是各因其才能而有用的，人人是衣食住行四項需要都有着落的。這樣一個新社會，還愁有人生的煩悶麼？

要實現這種新社會，青年們就要知道努力的方法。禁慾主義教人只管讀書，不管革命；縱慾主義騙人只管革命，不要讀書。這都是大錯。總理說：「除了革命，沒有學問；」又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凡是有志的青年，都應該在這個教訓之下來努力，才不至走錯路。

因為要在這個教訓之下，我們才曉得革命和求學是並不相妨的，而且在中國尤其是要同時並行的。青年當中往往有句錯誤的話，就是做了事就不能讀書，讀着書就不能做事。對於這一個錯誤指摘得最透澈的，有朱執信先生「讀書與做事」一文，希望一般青年去過細讀讀那篇文章，一定可以受到很深的感動。總理一生，就是我們大家的模範。他除了革命就是讀書；無論在軍中，舟中，車中，只要一得空，就拿着大本的書，一頁一頁的看。無論任何青年人的生活，難道還有比總理繁忙的嗎？總理一面做事，一面讀書，而許多青年說做了事，就不能讀書，豈不是

自欺欺人？所以青年努力的方法，應該是讀書與做事並重，這是第一點。做事，現在最重大的就要做革命的事；求學，就要求革命的學問。革命的學問就是一切能增加我們革命能率的學問。不能增加革命效率的，和那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學問，是不要去學的，免得消耗我們一分有益於革命的光陰。所以 總理說：「革命以外，沒有學問。」但是他又怕我們誤解革命就是片面破壞的事，所以又告訴我們說：「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這就是說破壞是為建設而始破壞的，學問是為建設而求的。沒有高深學問，三民主義怎樣能夠實行呢？所以求學是為要增加革命的效能，其意就在此，這是第二點。在三民主義的建設上，最需要的學問是科學。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沒有一項計畫或理論是沒有科學在裏面的。青年要負得起建國的責任，決不能像以前讀死書而可以擔當得起的。世界上唯美國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的教育最普及，但是它的社會科學教育卻沒有進步。所以有人批評美國是跛行的教育。我們中國向來求學的趨勢，却正與美國相反；偏重於社會政治文學哲學一類，而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却只有退步。美國教育是跛行，而中國教育直是斷了一個足。我們以後補偏救弊，直當以東方民族的革命精神去求美國的科學知識。這是青年努力所應注意的第三點。

總結說來，青年的煩悶，問題並不在慾望不遂，而在不知所以遂慾之道。只爲求遂慾，必至犧牲生以殉慾；所以縱慾主義，不特不是遂慾，並且不能遂生。反之，只爲防身以制慾，少數人或不失爲獨善，而大多數必至益禁慾而慾益橫決；所以禁慾主義終必爲縱慾主義所乘。爲個人之生以遂慾，不如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爲全社會之生以遂生，便當發展個人的創造慾，求社會生存能力的增加。增加社會生存能力，是全社會分子人人負責任，而不只是少數人的責任。人人依其聰明才力的高下而服社會之務，就是社會生存能力增加的唯一之路。青年應從增加社會生存能力的路上前進。以個人創造慾，充實社會的生存，便是青年們得着慾望的協調，生命的擴大。但是社會的生存之充實，必待科學的發展。有科學，纔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在這四種努力當中，才見着青年們條條都是生機蓬勃的出路！

革命的努力與方向之認識

——在黃埔同學會講演——

今天我來會演講是遲到了。

爲什麼遲到呢？因爲錯了方向，多走了許多冤枉路，所以遲到了。

爲什麼走冤枉路呢？因爲腦子裏的幻想錯誤，把走錯的方向當作對的方向走，所以走了冤枉路了。

同志們！青年同志們！站在革命前線的同志們！總理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很鄭重的叮嚀我們說：「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個「努力」二個字極爲重要，舉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了解的。

現在革命還沒有成功，所以要努力，尤其是青年同志們要努力。但是，要曉得乘汽車會走錯方向，在革命路上也是同樣會走錯方向的。不過，要曉得在革命路上走錯了方向，其重要比乘汽車要萬倍萬倍。

我們 總理的主義和一切政治上的主張都沒有走錯方向，更不會有什麼錯誤。但是自從C P加入本黨以後，我們的同志，有的早些，有的遲些，都看出他們是走錯方向了。爲防止這種錯誤起見，我們國民黨才舉行嚴厲的清黨運動！

C P加入國民黨沒有好久，居然能在中國橫行無忌，爲所欲爲，這是什麼道理呢？大家總以爲是因爲國民黨的度量太寬，組織太鬆，給C P以活動的機會；或者以爲是C P很兇，很厲害，

所以能夠佔據很大的勢力，我不管這些理由對不對，姑且先把構成C P勢力的分子，根據我的觀察來分析一下：即就這什麼C P呀，跟C P跑的呀，概括起來不外是二種：

A 投機的——這種人是夠不上說什麼革命的。任何一種團體，或任何一個黨派，只要有勢力的，他便要鑽進去。在袁世凱的勢力之下，他可以捧袁世凱做皇帝；在張勳的勢力之下，他可以跟張勳一同留辮子復辟……他們之所以跟C P走，完全是我們廣東人所謂「托大腳」的心理，一點價值也沒有的。

B 錯了方面的——這種人的本身是有主張，有訓練，有能幹的。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走迷了路。他把C P當作模範，當作萬能。他以為一定要在C P範圍之下，才可以發展自己的能力，達到自己的主張。這種人本身沒有什麼罪惡，惡罪的根源乃在走錯了方向。

在這十多年中，中國的革命沒有多大的發展；在這十多年中，俄國的大革命却大大令人注目。蘇維埃赤紅的金字招牌，已夠令人頭暈目眩了，何況他們又大吹大擂地宣傳自己好處，如之何能叫一般眼皮淺的人不慕他們的勢力而跟他們跑，一般見識短的人不受他們的宣傳而

跟他們走呢？慕勢力的人，我們不屑去講了，單說受他們宣傳而走錯方向的人吧。

受C P的宣傳的，他一定深信C P就是真理，C P是不錯的。其實他們認為千真萬確的，實在是錯誤了啊！

這種的錯誤，自從我們實行清黨以來，隨處都看得見的，現在且將事實來證明：

有人以為國民黨自十三年改組以來，力量加緊加大，都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功勞；假使驅逐共產黨，那麼國民黨豈不是要回復到十三年以前的原狀嗎？這是觀察錯誤。代表這一

種錯誤的便是汪精衛先生了。汪先生就是為觀察錯了事實，走錯了方向，所以現在的言論主

張才為C P所利用。又如馮煥章同志因在俄時被C P包圍，政治部多為C P包辦，所以社會

上都很注意。前天，兄弟和吳稚暉先生蔣介石先生在徐州與他會面，我們才曉得他對於C P

的觀察極為清楚。他沒有走錯方向，他并且很曉得武漢那幫人的錯誤，他說：『俄國共產黨是

要支配中國的全部，不論千變萬化，總之不離這句話！』這是在馮煥章同志的言論中最要的一

句話。他後來又把西北方向C P搗亂的情形詳細說出，更可以看出他對於C P的觀察是很

清楚的。他又說汪精衛，徐謙，鄧演達，都到鄭州會他，汪徐鄧幾個人都說C P如何不好，如何壞，

本人如何上C P的當，擬開會設法解決，並且自認爲錯。但是我們要注意，汪徐鄧雖罵C P不好，却不是覺悟的表示。兄弟在俄國時也常常聽見俄國人說中國C P的工人運動幼稚得很，這正如張作霖大罵兒子不懂事，辦不來事一個樣子的。汪徐鄧罵C P也不過是以老前輩的資格來罵罷了，和張作霖以老子的資格來罵兒子有什麼分別呢？他們實在還是在迷途中間。

徐季龍在漢口向羣衆亂吹亂說：「我們愈能欺騙敵人一分，我們的道德便是高一分。」他在鄭州却親自對馮煥章同志說：「共產黨人騙國民黨向左，又向左，再向左，左而至於無路可走！」這種矛盾的話，可以證明他們是走錯了方向，而且毫無覺悟的。

前在徐州有一位同志告訴我：說他曾經把佛經上一段故事說給唐生智聽：從前印度有一個老婆羅門能唸咒語，使片刻之間金銀珠寶從天上落下來任人攜取。有一天這個老婆羅門被一夥五百多人的強盜綁了票。老婆羅門叫同時被綁的一個徒弟回去想法弄錢來贖身。徒弟臨走時密對師父說，今晚便是月蝕，請師父千萬不要唸咒。可是師父一時併未留意，只是催着徒弟趕快走回去。徒弟走了，師父却想起唸咒來了。他就問強盜說：「爲何綁我？」強盜答道：「要錢。」老婆羅門說：「那可併不難，只要我頭上加一個花圈，我唸咒，錢就會來了。」

錢來了就請放我。」後來錢果然來了，站在一邊的二百五十個人爭取着珠寶就跑了；還有二百五十個人沒有取得的，叫老婆羅門再唸咒，老婆羅門說：「月蝕已過，再唸不靈了。」於是後二百五十人以為老婆羅門故意惡作劇，氣憤洶洶，將他殺死；一面速趕上去和前二百五十人爭珠寶，打起來。打到末了，祇留了二個人，其餘四百八十八人都打死了。留下來的二個人同是珠寶之主，却是還要分贓。這時兩人都起了惡念。甲命乙先去燒飯，而自己來守珠寶；乙就在飯中加砒霜；甲等乙送飯來就把乙活活打死；但不久甲也中毒死了。從這件故事，得兩個教訓：一是貪得無厭，自然要走到末路！一是方向錯誤，必自殺而殺人！

這段話不止是可以為唐孟瀟說法，一般錯了方向甘為CP利用的應該知道結局必定是自殺而殺人啊！

總之，跟了CP跑，就是錯誤，就是走錯方向。要免除這種錯誤，我們當然要打倒CP，然而關於打倒CP方向也有錯誤之點：

A，以為CP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一切都要打倒。

B，以為CP的手段方法都非常之好，可以利用的，所謂「殺其人而用其法。」

其實，這兩方面都不免錯誤。照第一種人的意思，因為C P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我們已打倒C P，就只好中止反帝國主義和反軍閥運動了，這豈不是同時也打倒了國民黨嗎？因為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而且他們又可以借着打倒C P而打倒和O P不相關而努力奮鬥的人，以快其排除異己之心；這豈不是很大的危險嗎？其次，如第二種人以爲打倒C P的勢力而用C P的方法，這也是不對。譬如用俄國的方法爲方法，用C P對待其他團體的手段來對待其他團體，這種努力是不是有價值呢？要曉得C P的方法，外是利用人家，如高唱左傾，擁護總理三大政策等的口號，不過想誘人家走到邪路，來給他利用罷了。這種努力的結果，就如強盜大家爭珠寶而共死一樣，算得什麼努力呢？如果這也當作努力，那麼努力的害處就不堪設想了。所以說打倒C P的一切的，和利用C P一切方法的，都是錯誤。前者的錯誤，是在打倒C P，而連帶忘了自己本身是國民黨；後者的錯誤，是在利用C P的方法來欺騙民衆，無異把C P的邪路再走一道。有些國民黨的同志自誇背後有多少民衆，這不啻是把國民黨丟開了；效法人家奪取政權，佔領機關，以圖個人的幸福，即是把唯物史觀變成唯我史觀了。

有的人說C P很努力；不錯，俄國的C P確有很努力的，從前我在俄國的時候耳聞目睹幾件事，可以證明。至於中國的C P，那末，實在不敢恭維，實在沒有俄國C P的精神。我們看上海方面C P自己批評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因為C P的指導者都躲在背後，沒有出來領導拚命。這可以證明他們的不努力。再進一步來說，就是俄國C P的努力精神也是沒有價值的。俄國學德國民主黨的方法，努力的人都有報酬；喊口號要錢，遊行要錢，宣傳要錢，除了所謂唯物史觀中的自我主義以外，再沒有旁的東西了。一個人要出了錢收買，纔行遊行示威，喊口號宣傳，在不知內幕的民衆看來，他們真是努力極了。試問這種努力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呢？我敢說這些都是走錯了方向。

怎麼的方向纔對呢？對的方向是「中」的，不偏於一面的，中國的事并不是弄不好，但總失之過與不及，要求「中」却是極難。不過中字並不是「折中」的解釋，我前四年碰到鮑羅庭，鮑問：「中國之好處在什麼地方。」我說：「中國之好在「中」。」鮑說：「這個「中」字不好，第一，「中」沒有本性，第二，「中」一變為調和派，再變為騎牆派。」我就回答說：「這不是這麼說的。所謂調和派，如甲欲十而乙欲五，而調和的丙便是七；所謂騎牆派乃騎在二堵牆

中。「中」是適者生存的「適中」的意思，「中」好像射箭射中的意思；不偏之謂「中」就是最適中的意思。說中無本性，是錯誤的。「中」是客觀中的中（唯物的），非主觀中的中（唯心的）。走路的中間不能偏左幾尺，也不能偏右幾尺。」

「中」不是調和，「不中」就是「偏」，就是「不對」。求「中」而誤解為「妥協」實在是大誤。總理常言革命，同時常言「中」，並不是調和，乃求「適中」，孫先生常講大學，中庸，孫先生講大學中庸，乃是孫先生的大學中庸，乃是適者生存的「適中」的大學中庸。

現在把搗亂的共產黨清除，同時也要把腐化惡化的反革命份子清除。單單肅清共產黨而日趨於腐化，便是「不中」；單單肅清共產黨，而日趨於惡化，日趨於搗亂暴動的C P行爲也是「不中」。「不中」是不適宜的，是錯誤的。走了這種方向，便是錯誤的方向。

我們努力要認清了方向，認清了方向，這種努力才有意義才有價值。方向沒有認清，盲目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沒有價值的。什麼是正大的方向呢？正大的方向便是「中」。我們認清了「中」的方面而努力，這才是青年同志的使命！大家要認清了方向，不要像乘汽車錯了方向，跑了許多冤枉路！

武漢方面的三種反共與三種心理

何鍵既已占領了武漢，一班聯共的份子，便宣言反共，同時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也發表宣言，正式退出他們的國民政府了。在他們自己，好像還是一種有計劃的變計和退出，但是武漢一方，可算已經為我們主張所戰勝了。在先的主張，是何等利害。怎樣同生共死，怎樣連合戰線，吳稚暉先生所謂肉麻透頂了的，曾幾何時，如今便變成這個局面，大概也非他們始料所及吧。其實在共產黨原不過將國民黨當做他的工具，他們原說工具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到了相當的時期，用不到這工具，說丟就丟了。現在他們的退出了什麼，就她丟去了什麼工具罷了。至於那班聯共的份子，因為發現了莫斯科收拾國民黨的計劃，知道共產黨要練共產軍來消滅國民革命軍，要教老國民黨員專門做劊子手，到自己黨裏去互相殘殺，別的事情却輪不到他們過問，他們看了這樣的計劃，便是腦筋向來再糊塗，再着迷的人，也恍然大悟，不寒而慄了。所以他們最近已經澈悟，共產黨如今也要清黨的，所清的就是他們這班人，他們的地位，目前就解決得快了，想想不如趁早回身吧。武漢反共的人，大概情形是如此，如果說得詳細點，可以分作下列三種。

第一種是直接接受共產黨的策略的，一切以退爲進，表面上雖喊反共的口號，骨裏還是作有計劃的進行。第二種便是新近發現共產黨收拾國民黨的計劃的。他們從前對於共產黨的估量太大了，太抱好感了，拿共產黨真當做個朋友，那知現在共產黨忽然用不到他們，覺得可以犧牲他們了，馬上便犧牲掉他們，沒有一毫顧戀，簡直是反面無情，太大的出於他們意外。在他們看見兩湖做了犧牲品，看見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被人分化了，看見中國革命前途因共產黨的搗亂，發生了極大的障礙，他們總不甚動心，不甚介意，他們最不满意，最覺傷心的，就是看見共產黨實在不過以他們這班老黨員爲工具，並無誠意和他們合作，目前就要攪掉他們的地位了，他們才發急而且憤恨。這兩種反共的以外，還有一種，就是武漢民衆軍衆，直接感受痛苦而發的。武漢方面的軍人，不願因有共產份子盤據在那裏，而造成自己環境上的恐怖。一方面共產份子時時要奪取他們的權柄，來支配他們，也是他們大不願意的。至於人民，在各方面無不極端身受到赤化的苦處，大部分都預備挺而走險，和共產黨決一死鬥了，因此地方上便有了最近的種種變化。

以上是武漢方面反共的人，三種不同的情形。至於既經反共以後，大家的心理，也各各不

同。尤其是對於我們同一反共的人，心理如何，我們應該注意。第一種，武漢的人民祇知共產黨的不好，大家去反共，而不知道國民黨究竟如何，甚且以爲國民黨的一切，也不過比共產黨和緩一些罷了。現在長江上下游的交通，既然不便，上海的報紙，那邊又看不到，所以我們的情形，武漢人民，完全不知道的多。新近有人從武漢來，說那邊連許多有知識的人，也不明瞭這邊情形，以爲南京雖有中央，也不過是反共罷了，武漢本來也有個中央，既已反共，也就行了。他們把全部的事業，祇看反共上面，至於黨的真象，清黨的真象，全不了解。交通不便，消息隔閡，爲害一至於此。其實凡在東南，目睹我們數月來的工作，一定曉得，倘若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沒有在南京行使職權，從四月起大家就要完全受共產黨的支配，可以說不但大江南北的各省不了，就連珠江流域，也通通要受兩湖以往所受的赤禍了。到那時，共產黨的淫威是何等的兇狠而擴大，兩湖的問題，豈是兩湖的力量，像現在這樣情形，便能輕易解決的嗎。也不但東南人民看得清楚是如此，我們工作的重要，是全世界全中國人士所共曉的，只除掉半年以來，曾經被共產黨完全把持，完全欺騙，完全迷惑的兩湖罷了。況且南京乃 總理指定的首都，政治會議議決，趕緊實現 總理這個遺志的，國民政府諸委員，乃經過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政治會議，議決

和中央執行委員一同在南京集合的。這時候的南京，有軍閥逼緊於前，有共產黨猖獗在後，幾乎不把我國國民性完全消滅了，不把國民革命的力量完全障礙了。如果沒有中央黨部中央政府，在辛苦艱難之中，正式擔負起國民革命的使命來，奮鬥向前，共產黨的貽禍全國，固然不可收拾，就單是軍閥，也足以暫時毀滅我革命的力量了，全國那裏還有今日呢。所以無論在名義上，在事實上，我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實在是毫無遺憾的啊。

至於武漢的偽中央，偽政府，無論他們聯席會議也好，分頭辦理也好，在事實上總是一個共產黨所造成，而專為他們自己應用的工具，大家現在既知道共產黨是不對的，大家是應該反共的，那末，這種全由共造，而專為共用的工具，當然也不對了。如果一面反共，一面又承受共產的政府，這是何等矛盾。這不但是我們所不許，簡直是中外人士，大家共同不許的。不但為局外人所不許，就連他們自己，要挾持着共產的工具，來號召反共產的國民革命，也是事實上所不許的啊。武漢的人民何以不想想，假使當時沒有這個偽政府指揮一切，共產黨如何會猖獗到那樣，大家身受的痛苦，如何會利害到那樣呢。武漢的黨員何以也不想想，既已知道共產黨要犧牲誰就犧牲誰，既已決定從今以後，再不受共產黨的支配，為共產黨工作了，何以還要跟着大家，

保持這種腫腫觸鼻的共產遺說去做把戲，這到底是何居心呢。假使大家反共清黨不是誠意的，仍舊處心積慮以搗亂爲榮，以欺騙爲務的，那就不談了，如果不然，明知其違背黨義，違背黨令，而偏要這樣做去，究竟置黨紀於何地，對於黨的責任心，豈不太缺乏了嗎。

以上第一種心理，是不明白我們這邊情形的。至於第二種心理，乃雖然深知道我們內容，雖然決心以後再不幫共產黨的忙了，但是因爲以前過於贊助共產，過於敵視我們了，如今改聯共爲反共，已經做得勉強，如果馬上再要和從前的敵人，一下子就合作起來，面子上實在過不去，所以暫時仍借那邊的政府敷衍着。武漢方面確有許多人的心理是如此。陳可鈺同志曾經來電報說過，兩湖如今更沒有人愛戴共產黨了，但是要他們馬上就和我們聯合起來，有些人頗覺面子上難堪云云。其實一個人既然明白自己以往是錯了，就該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人來，才不失爲勇於爲善的。像這班人的心理，是已經洗心，而尙不能革面，豈不可怪。

還有第三種心理，是完全意氣用事的，像汪精衛主張反共，同時又主張倒蔣，就是這種心理。我和吳稚暉先生曾經打電報，由馮煥章同志轉給他，大意說「現在黨內一切應該都不管，只要先澈底清黨，你如今也主張反共，好極了，但是何以同時又主張倒蔣的呢，實在奇怪得很啊。」

若照你反共的主張看來，你所要倒的，應該是聯共的人了，難道現在蔣介石同志，忽然聯共了，你所以非倒他不可嗎。又難道因為你自己現在既出來反共，旁人雖是同你一樣主張的，也用不着了，像蔣同志雖有已往反共的功績，現在只好做個功狗可烹了嗎。不然，如果反共同時可以倒蔣，像從前你聯共時，你的同志也可以喊聯共而同時倒汪的口號了，你覺得妥當不妥當呢。

你對於這一邊的許多老同志，如果不高興，你儘管和其餘的人算賬，我們決計不自愛惜，可以束手待罪的。至於蔣同志介石，他是革命力量的中心，全體武裝同志的領袖，你不應該和他過不去。」汪精衛的復電也由馮同志轉來，他說：「他同蔣介石同志，乃公憤而非私仇，他所要求的也祇以黨國為前提，如果能達目的，他死也可以，亡命也可以，他去年離廣州時，曾經和蔣同志說過，你能革命，我雖終身在海外可也。」他這一個復電之中，所暴露的全然是意氣用事。大概他以前已經宣言倒蔣了，現在這句話不能收回，便索性固執到底。若就他的這些話論起來，實在費解極了。蔣同志究竟能革命不能革命呢。蔣同志現在既然能革命，照他的話說，他就該不回來了，何以他在四月間又回來的呢。而且蔣同志能革命，他一定就不能回來，這又是個甚麼道理呢。他的心理，第一，總以為別人不能革命；第二，表示他不能和同志合作；第三，一定要等

別人不革命時，他才回來革命。這樣的心理，無論在革命的論理上，和事實上，通通不可解。

具有以上三種心理的人，無論反共是爲免除自己痛苦的，或是爲避去攻擊的目標的，總之，是被環境壓迫到最後一步，非找出一線生路來不可的了。如果由忠實的同志，設法將他們引入軌道，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再不必把個人的成見提出來，大家都歸到國民革命的本旨上去，受本黨的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支配，把一切革命的實力都集中了去對付敵人，而不互相抵消，這是一件何等可幸的事。無奈事實上不然，他們一面反共，一面又鬧那極無聊的面子和意氣，一面仍在那裏做種種反動的事情，造出許多謠言來，欺騙那班沒有了解我們真象，不知道清黨真正經過的人，其餘一切，自然也和我們合不攏來了。前兩週上海的謠言，鬧得光怪陸離，無所不有，吳稚暉先生回來告訴我，彼此都不覺失笑，大概因爲上海有五方雜處的人，我國人又愛聽謠言，愛傳謠言，所以他們便利用這個來煽惑，然而伎倆到此，實在已窮，我們只要加意做我們的宣傳工作，教社會澈底了解我們反共清黨的實在經過。謠言會不關自息，是非會不辨自明的啊。

清黨之意義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這次的清黨運動呢？要澈底明瞭其中的意義，必先得認清楚本黨的使命，本黨的精神，和本黨的歷史。

中國國民黨最初的組織是興中會，後來擴大為同盟會，民國初年改為國民黨，二次革命後改為中華革命黨，民國十三年才改為現在這個名稱。

興中會成立於前清光緒二十年。先生自傳曰：「余自己西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定傾覆滿清，創建民國之志……至甲午中東戰起……乃創立興中會，不圖風氣未開，人心錮塞……應者寥寥。」又興中會宣言曰：「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於他族。」我們再默念一下，總理遺囑裏所謂「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及「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的話，就可以了然。總理自組織興中會至於辭世的剎那間，始終是以喚醒錮塞的人心，並領導着他們去革命來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家的危亡，為自己的責任，同時也就是總理付託給中國國民黨的責任。

我們天天說革命革命，革命到底從那裏來的呢？牠不是從我們口中喊出來的，也不是牠自己會從天上掉下來的，牠是應環境的需要，從人民的心窩裏鑽出來的。時代不停地推進，文

明踏着大步前行，人類的慾望和智識也似潮水般湧增，而社會的制度，却是萬分頑固不靈，牠不管你說什麼自由平等，平等自由，牠只是閉着眼睛，掩着耳朵給你一個不理。舊制度不適用於新的環境，簡單的理論不能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新時代的人物忍受着無窮的痛苦，冷酷的制度只是板着老繃的面孔。可是一朝有個絕頂聰明，勇敢無畏的人登高一呼，革命的火燄就爆發了。在中國，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總理孫先生。他不但敢挺身首先向舊勢力攻擊，把我們從夢中喚醒，他還根據着中國實際情狀的需要，世界思想潮流的趨勢，指示給我們一條革命的道路，就是三民主義的道路。

革命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得成功的，必須集合信仰相同的同志來共同奮鬥，於是就有革命黨。因為革命是以一切舊的腐敗的思想和制度為破壞的對象，在初期革命的勢力尚未充分養成的時候，那裏敵得過那根深蒂固的舊的反革命勢力呢？革命家在那個時期是時刻都有殺頭的危險的。所以，那個時候，敢來加入革命黨的，沒有一個不是極純潔，極勇敢，不能成功就準備成仁的志士。這種人自然是用不着什麼組織，什麼紀律來範圍，也可以同心合力去奮鬥犧牲的。我們只看看與中會和同盟會時候的精神，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役那種驚天

地，泣鬼神的舉動，豈是區區什麼組織，什麼紀律所能造成的？然而這種熱烈的感情終竟是靠不住的，只能維繫於一時，不能繼續於久遠的。曾經暗殺過這個親王，那個將軍，曾經參加過黃花岡之役幸而不死的同志們，到民國之後變節的不是也還有嗎？無他，一個人並不是一定要存心變節才會變節，敵不過環境的壓迫，利祿的引誘，就會不知不覺地軟化了。況且，縱然這少數的志士能始終不變，而革命的範圍一天天地擴大，革命的戰士一天天地增加，也一定要有極密的組織，極整肅的紀律，才能把精神團結起來，把力量集中起來，把革命黨的生命長久維繫下去。

自民國以來，因為我們也常常佔領着一塊根據地，來和反革命的勢力搏鬥，有許多黨外的人，甚至不少自己的同志，都以為本黨是一個政黨，和那些什麼北洋派，奉系，直系，不過是派別的不同，並不是性質有什麼差異。這真是荒謬之極！不要說這些直系，奉系，北洋派等等根本上還夠不上叫政黨，就是真正一個完全的政黨也何能與本黨相提並論？一個政黨的根信條是承認目前的現狀，而本黨第一個大前題就是要破壞目前的現狀。這如何能說性質是相同呢？中國國民黨並不是坐在議會裏賣口才，博拍掌或是舉票，乃是站在戰場上為一種看得見

捉得着的理想——三民主義——而用積極的行動去奮鬥的革命黨。我們可以更明白乾脆的說，除掉了革命的精神就不成其為中國國民黨，抹殺了三民主義也不成其為中國國民黨。

我們說到清黨這件事，翻一下本黨的歷史，就可以看見乃是常有的事。民國二年解散了國民黨，另行組織中華革命黨，是第一次的清黨。總理自己說，是「恢復民國前革命黨的面目，而加以嚴格的訓練。」言外之意，就是不滿意宋教仁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引了許多腐敗官僚，滑頭政客進來，把同盟會的好份子也腐化了去，把活活的一個革命黨，弄成個不生不死的政黨。

第二次清黨，是民國十三年中的中國國民黨改組運動，這一次的改組運動，包含着幾種非常深刻而重大的意義。第一，牠把第一次清黨的精神更加澈底地實現出來，毫不姑息地去掉舊的腐敗份子，毫無限制地吸收新的青年學生；第二，牠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嚴密的組織，和注重民衆運動的新方針；第三，他重新確定了三民主義在本黨的絕對性，和本黨在中國的獨一性——以黨治國；第四，他在本黨的歷史上成了一個「托孤」的紀念，因為還沒有等到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我們的總理孫先生就長辭我們而去了。

從上面的觀察，我們可以歸納出下邊這幾個要點來：——

一、三民主義是孫先生適應中國的實際環境，根據着世界思潮的趨勢而創造的救國主義；中國國民黨是爲喚起民衆及領導着他們去實現這個主義的革命黨。

二、中國國民黨無論名稱如何更換，組織如何改變，而宗旨和精神是始終一貫的，不能更改的。他的宗旨始終是實現三民主義，他的精神始終是革命的精神。

三、中國國民黨爲完成他的使命起見，是不停地在鞏固他的基礎，嚴密他的組織，整肅他的紀律，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在清除他內部一切不良份子和各種的障礙。

現在再來觀察這次的清黨。我在前邊說過，民國十三年改組，加入了很多很多的青年，這裏頭有一部分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當時就有很多同志懷疑：一個媳婦有兩個家婆尙且不易對付，何況一個人同時做兩個主義不相同的黨員呢？李大釗以是乃代表大會中鄭重負責當衆聲明，共產黨徒是純粹以個人資格加入來信仰三民主義，遵守中國國民黨紀律，實行做國民革命的工作的。這無異是說凡是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都是已經脫離共產黨的關係的。而且，實際上凡是共產黨員入黨也和普通人同樣經過一樣的手續；總理也始終未說過要對共產黨員有什麼優待。在總理的意思，以爲革命乃是大家的事，救國更是匹夫匹婦的

責任，這裏頭並沒有什麼權利可爭，來的人自然都是誠意來革命來救國的，我們爲什麼先要存着卑鄙的心理去疑心人呢？所以總理雖未說過要優待他們，也着實替他們解釋過不少的。

並且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選，也給他們佔了不少的席數，中國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總算推心置腹，無以復加了。他們給我們的報酬是什麼呢？第一，就是給我們製造了一批非常

能幹，又會看風使帆，又會吃西陂口沫的左派；第二，又給我們製造了一批五花八門的右派，新右派，新新右派，新軍閥，新官僚，工賊，昏庸老朽，老朽昏庸等等，似乎中國國民黨，除了這些就什麼都沒有了！幾年以來，到處聽見人說共產黨把持我們的黨部，破壞我們的基本組織，分裂我們同

志的結合，如今看起來，真是一點也沒錯。拿各地清黨以後的情形看起來就知道了。怎樣的

情形呢？黨部是空虛的，民衆是紛亂的，上下是不相連絡的，這不是共產黨那三種陰謀所造成

的結果是什麼？我們眼看着人家一面挖我們的心，一面吸我們的血，一面割我們的手足也不

管嗎？管就得清黨。

我們爲什麼要保護我們的黨呢？簡單說就是要救中國。共產黨爲什麼要破壞我們的

黨呢？就是要害中國。要救中國就得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要打倒這兩個東西，第一步，就是

北伐。我們要救中國，所以無論如何困苦艱難也要北伐；共產黨不要救中國，所以無論如何艱難困苦也要破壞北伐。否則，當我們未出師以前，還可說是怕實力未足，徒勞無功；然而當我們已下湘鄂，定閩贛，出師東向，和孫傳芳張宗昌數十萬虎狼之師血戰於沙場的時候，爲什麼偏偏要散佈種種的謠言，什麼英雄主義，個人獨裁，什麼軍餉不清，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妥協等等來破壞軍事領袖的信用，搖動前敵將士的軍心？難道你們安坐武漢，才算是革命？難道你們斷絕軍需的接濟，置十餘萬武裝同志生命於不顧，就是提高黨權？不錯，幾時國民革命軍死絕了，共產黨自然就會把國民黨的黨權和中山先生的遺像擡到歷史博物館的六層樓上去了，那自然很高了！

共產黨果然是真看得破。當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虎視眈眈，惟恐沒有藉口以實施他們武裝聯合壓迫革命軍實力幫助軍閥的時候，他還要不惜犧牲所謂他們的農工羣衆，大暴動衝入租界，給帝國主義者一個藉口。本來在他們看起來，農工和國民黨都不過是貓爪，國民黨已可破壞，農工爲什麼不能犧牲呢？只要中國共產黨能存在，中國四萬萬人死絕了有什麼要緊？反正餓着肚子的俄羅斯人還多得很呵！中國亡了又算得什麼？反正中國共產黨還可以

到俄國去呵！有人說，共產黨是要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才破壞國民黨，所以才阻止北伐破壞國民革命。如果真是這樣，那到也不失為馬克思的忠實信徒，可是他們的陳大領袖獨秀先生却老實對吳稚暉先生承認二十年就要實行共產，縱然祇是掛掛招牌！

本着我們已往的使命，本着我們一向的精神，我們能容這個破壞本黨，犧牲國家，欺騙農工，背叛主義，只顧爭奪私人權利的中國共產黨嗎？不能的！（不但是我們不能容牠，凡是馬克思的忠實信徒都應該起來打倒這個假共產黨！）我們過去的清黨只是把不良份子清出黨外就完了，我們這次的清黨是要進一步把共產的死灰都要送還給俄羅斯，不能讓牠遺留在中國的。乾脆地說，這次的清黨就是要消滅中國共產黨！

可是我們應該知道共產黨全國的黨員，據他們自己的報告說，不過八千，何以他以這樣少數的人就能操縱把持我們各地的黨務呢？這就是因為他們一方面利用中央的威權，當譚平山當組織部長的時候，在各地先立下一個基礎；一方面又利用各地的真正的土豪劣紳勾結着一切無賴份子。這樣的上下包庇，自然就可以橫衝直撞，鬧得真正的良民避之惟恐不及，還敢來入黨嗎？各地的下級黨部十有八九都是這種情形。這種黨員不要說三民主義不能了解，

恐怕是連三民主義叫什麼還說不出來。本來當初要他們入黨的人，就只是想利用他們來投票，他們也只想要張黨證來做護身符，或者還正不要本錢，樂得做個人情，他管你什麼三民四民呢。我們要消滅共產黨，非將他這個基礎剷除不可。我們要清黨清得乾淨，非將這班無賴份子，土豪劣紳，及一切不知主義為何物的黨員，一概清除出去不可。不怕每個地方只剩下一個黨員，甚至沒有一個黨員也不要緊。我們清黨既不能單以黨證為憑，也不能因為他沒有共產嫌疑就算是黨員，我們一定要以了解主義與否為去取的標準。說到打倒土豪劣紳，共產黨叫得比誰都響，但是有好多是「土其所謂土」，「非吾所謂土」，「劣其所謂劣」，「非吾所謂劣」的，我們在這種地方一定要分別清楚呵！

我常常想，中國共產黨不過是五六歲的乳臭小兒，中國國民黨却正當壯年經驗豐富有作為之年，論份子中國國民黨多他百倍，論勢力中國國民黨也大他百倍，為什麼倒被他這個小鬼搗得亂紛紛呢？雖說是人家挑撥離間的手段非常毒辣，然而上當不上當到底也全在乎自己。

雖說很多都是敵不過人家威脅利誘而上當，然而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對於主義沒有澈底的了解，故沒有堅決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種力量來抵抗引誘和威迫，因此，今天以為三民主義

是好的，明天也許以爲馬克思主義更好，後天或者又以克魯泡特金的主義更好了。這如何能做忠實的黨員？這樣的黨員如何能夠團結起來？這樣的黨如何能不坍臺？對於主義懷疑是頂要不得的，尤其是革命黨對於自己的領袖和主義信仰不篤，真是革命黨的致命傷。因爲一生懷疑，就會變成反動。我敢武斷地說一句，我們的同志，就是常在總理左右的同志，也多半對於總理只有絕對的敬仰，沒有絕對的信仰；對於主義也只有口頭上的讚許，沒有真心的篤信。人人都以爲總理的見解也不過如此吧，我的見解也不見得比總理差吧。甚至於站在領導者地位的人，也居然說得出我們只要努力國命革命，國民革命成功以後的事，可以不必過問。這成什麼話！我要問問說這話的人是真糊塗還是裝糊塗？如果真是這樣糊塗，那就連黨員都不配做，不要說是領導者了！如果是裝的，那我們就要問爲什麼要如此不光明；是怕還是故意不說，來迎合某種人的心理？跟隨總理左右二十多年的人，還不免如此，何況一般普通的黨員呢？如何能怪他們不篤信總理和他的主義呢？如何能怪他們抵抗不住威逼和利誘呢？啊，想起羅馬末年基督教徒信仰主義那種堅定不拔的精神，受了獸餐火燒種種奇奇怪怪的酷刑而至死不怕不變的精神，我們真要慚愧死了！所以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企

圖，就是要造成絕對統一的信仰。以我個人的經驗，我深知就是處理一件很小的事體，我們的見解都還不及 總理。我們不但是要敬仰 總理，我們簡直要絕對的信仰他和他的主義，甚至於迷信他也是應該的。吳稚暉先生說：六十年前中國會產生一個孫中山，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都應該有這種信念呵！譬如說到馬克思主義適合不適合於中國的問題，如果我們能澈底理解自然是最好，否則我們就應該相信如果是馬克思主義能適合於中國，總理早就會採用了牠，（那裏還輪到陳獨秀去當領袖呢，）不用嘔盡心血來創造自己的主義了。我們須知 總理創造出三民主義來，不是爲增光圖書館的，是要使牠實現的，（如果照中國共產黨的見解，是只有把三民主義放進圖書館去的，）而中國國民黨就是要用積極的行動去促進這個主義實現的革命黨。但是黨員先沒有一個絕對統一的信仰，如何能有一致的行動呢？季陶說得好：「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我們這一次的清黨一定要十分注意於共信之認識，互信之確立的；否則，雖然把共產黨撲滅的干干淨淨，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意義。

末了，我們要認清楚的，就是我們每次的清黨，在行爲上雖是消極的，而在動機和結果說却是積極的，進步的。中華革命黨比國民黨進步，中國國民黨比中華革命黨更進步，這是事實，不

是空話。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希望，不但徒然希望而應切實去做到，清黨以後的中國國民黨一定比清黨以前的中國國民黨更要好，更要進步。而且論理也應該是那樣的。清黨以前還有共產黨破壞搗亂，清黨以後這些障礙都沒有了。做得到或做不到全靠我們了。我們要緊緊記着：清黨不只是要把共產份子，投機分子，土豪劣紳清除出去，並且是要把：

本黨的忠實同志團結起來！

本黨的基礎鞏固起來！

本黨的工作表現出來！

本黨的精神發揚出來！

本黨的使命完成！

本黨的主義實現出來！

上 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293B

